

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基于现代报刊视野的
描述和分析

姓名：吴幼叶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新闻学

指导教师：王春泉

20080611

摘要

创刊于 1897 年的温州《利济学堂报》与维新变法共命运，在历史风云变幻之际，开创中国学府科技学报的先河，为中国医药学报之始；对于地方文化现代化发展而言，它则扮演戊戌时期温州传播版图的重要建构者之角色。另一方面，《利济学堂报》为浙南最早的维新变法报刊，其主办机构利济医学堂为中国最早的中医学府。主办者陈虬首创的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利济学堂报、心兰书社构成四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传播组织结构和医疗传播、教育传播、期刊传播和图书馆传播相辅相成的特殊模式，构成一个极具新闻学与科技传播学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并成为其后学府科技期刊的范本。温州的地方特质、文化禀赋深深影响了该刊的运作，使其稍稍褪却激进色彩，更加注重务实经营。反过来，该刊通过自身的传播促进了温州现代化社会的发育，同时也成为温州近世社会变迁的折射窗口。

关键词：利济学堂报 陈虬 新闻传播 科技传播 教育传播

Journal of Liji Medical School of Wenzhou in Wuxu Period

A State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Field of Modern Newspaper

Abstract: To re-know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Journal of Liji Medical School in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assumes the method of Primitive materials based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were researched.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author finds :The Journal of Liji Medical School which had the same fate as the Reformation was the bud of Chinese university sci-tech journal, the first Reformation publication in the southern Zhejiang, and w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bulletin. Its founding organization Liji Medical School was the first Chinese medical school. It is Liji Hospital, Liji Medical School, Journal, Xinlan Library that formed the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each other, and shaped a special communication model of medicine, education, journal and library .This typical case that contained the profound study value of journalism and sci-tech communication had become the paradigm of later university sci-tech journal. Wenzhou's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ave profoundly made it less radical color, more pragmatic management. This journal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nzhou, and reflected modern Wenzhou's development.

Key words: Journal of Liji Medical School Chen Qiu News communication
Chinese Sci-tech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吴幼叶 指导教师签名：王学军

08年6月11日

08年6月11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吴幼叶

08年6月11日

前言

1955年，在《上海中医杂志》的创刊号上，祝苕梅撰文《我所看到两种最早的中医期刊》¹，文章认定：最早的中医定期刊物是1904年（光绪30年）在沪上发行的、由周雪樵主编的《医药报》。《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附录刊载的389种中医期刊的名录中，也将《医药报》列为中国中医刊物的发轫。本文通过整理查阅相关的古籍文献，认为对最早的中医定期刊物的研究至少可以回溯到比《医药报》早7年就已面世的《利济学堂报》。

1897年1月20日，陈虬（1851-1904）编辑出版的《利济学堂报》，尽管发端于僻处东南一隅的蕞尔小城温州瑞安，但它却驮载着不容小觑的历史标帜性意义。这份由中国最早的新式中医专门学校——利济医学堂、浙南最早的医院——利济医院向全国发行的期刊，不忝于中国中医药学报的滥觞之作，更开华夏高校科技学报之嚆矢。

在狂飙突进的浙江维新热潮中，该刊还发出了打破僵滞局面的第一声。浙江的报业服膺于华夏报业萌生的规律，肇始于西方传教士之手，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应思礼等在宁波创办了《中外新闻》。19世纪70年代掀起的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心区域囿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寥寥几地，浙江几乎处于缄默失语的境况。浙人自办报刊的热忱，在戊戌变法前后方被激荡而起。赵晓兰在《浙江近现代报刊史概述》中，将《利济学堂报》置于其时浙人自办报刊之首。²同时，就期刊业自身的历史演进而言，戊戌变法时期才揭开了国人自办期刊的大幕。在此之前和其后一段时间，报、刊并未分家，一概以“报”约略涵盖报和刊。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将这段时期称为“民报勃兴”的阶段。而在鸦片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的将近半个世纪内，纷次出现了传教士所办的170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到了我国报刊总数的90%。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人竞相办刊，有力地改写了期刊业外人独揽立言的面貌。《利济学堂报》应时而兴，声光

¹祝苕梅，我所看到两种最早的中医期刊，中华医史杂志，1953，（3）：162。

²赵晓兰，浙江近现代报刊史概述，出版发行研究，2002，6页。

炳然，成为浙江第一次自办报刊高潮中首个卓荦不凡的范本，成为国人第一次自办期刊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标杆，足资寻绎其作为“历史现实”而存在的深长意味。

此外，对该刊的研究，还应该将其置于戊戌变法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予以透视，它不仅仅是科技传播、图书馆期刊、教育传播载体，更是当时温州政治传播的渠道、思想解放的泄洪口，其从诞生到消逝的生命周期，紧密熨贴着维新运动的发展历程，为维新呼号而生，因维新挫败而灭，忠实纪录了戊戌浪潮中温州社会运动的脉络，成为当时温州传播版图中的一个显著范本。

笔者粗略整理了一下该刊的研究、传世状况，对其研究情况甚少。从科技期刊研究史方面看，姚远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¹一书中，列表将《利济学堂报》置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之首，认为科技期刊中“学府最早的为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于光绪廿三年（1897年）1月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其主办机构利济医学堂“虽非高等学校，但为高等学校的前身，与高等学校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大学科技期刊的萌芽”。史和、姚福申等在1991年编成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²（1815-1911）中，简略提及了该刊的基本情况，但仅只将其定位为“温州创办的医学杂志”。姚远、汤晰等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研究报告》中认为：“1897年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创办的《利济学堂报》、1901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创办的《农学报》和1905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三种医、农半月刊的创办，标志着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萌芽。”

此外不妨援引图书情报学的利器来探究该刊的传播路径和馆藏情况。上海图书馆编定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³三卷中，在篇目汇总中提及了该刊的简况，至少可以断定这份地方名士戮力打造出的期刊的传播影响力已辐射到沪上。1961年至1981年，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制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⁴，是迄今为止研究1949年以前中

¹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59页，463页。

²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95页。

³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二，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

⁴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文期刊馆藏的最权威工具，50家省市级图书馆参加整理，前后两版，历时20年，在其增订本的“补遗”中提到了该刊的原件现在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以推断之，该刊的传播辐射那时已渗透至京畿要地。笔者统计之，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该刊第一至七册、第九至十四册的原件，共13册。另外在温州图书馆笔者还发现了《利济学堂报汇编》16册，在瑞安市文物馆则保存有该刊的第二、四、六册，未出《汇编》范围。再者，2004年初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中的《利济医学著作集成》，共10种14卷，此中收录了不少曾刊载于该刊上的医学文章，可借之管窥当年刊文的风貌。

如此一份岿立在晚清瓯越科技发展史和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史上的期刊，对彼时社会风潮的激荡昂扬起到了警钟木铎般的效应，但是在报刊志的各种研究体系（通史、断代史、科技期刊专题史）中，它长期以来处于缺位、化约状态，亟待整合。这也是本次研究希望能填补的些许空白。笔者希望通过从各个维度对该刊真实情况的还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启迪，从而对今日各类报刊（高校学报、地方报刊、科技期刊）的操作有所借鉴。

另外，在晚清温州维新中起主要维系作用的利济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全方位打造的立体传播架构，值得研究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陈虬首创的利济医院（浙南最早的医院）、利济医学堂（近代最早的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学堂报》（近代最早的学府期刊）、心兰书社（近代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构成四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传播组织结构和政治传播、医疗传播、教育传播、期刊传播和图书馆传播相辅相成的特殊模式，形成了一个极具新闻学与科技传播学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而这对今日许多单一依靠行政拨款来运作的高校科技学报来说，也提供了另一条多元经营、充满有机自发生命力的蹊径。

第一章 晚清温州社会场域下知识生态与戊戌传播版图的构建

本章将通过晚清温州社会场域、知识生态及戊戌温州传播版图的简单描摹，勾勒出《利济学堂报》产生、实践、影响的社会大空间和传播背景。

第一节 晚清温州社会场域的描述

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历程在蕞尔小域温州身上得到了很好的折射和体现。西方的坚船利炮带来了强制性的文化输入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震荡，在欧风美雨的荡涤下，温州无法再偏安东南海滨一隅，而只能半推半就地被裹挟进风云际会的时代更迭之中去。

鸦片战争成为温州迥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生态的分水岭所在。在这场摧坼神州大地的战争之前，温州社会沿袭固守着封建性、宗法性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中聚族而居，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紧密绾系，织就出瓯越大地上绵延了数千载的自然经济的原生态。

温州物产丰饶，又毗邻东海之滨，坐拥地利之便，因此在铁板一块般苛严的海禁钳制下，仍有为数不少的出口物资，以茶叶、瓯柑、明矾、靛青、竹子、木材、盐、铁、药材等货物为主，尤以茶叶最为大宗。¹温州又是浙南闽北土特产的集散市场，商业素称繁盛，民间经商气氛浓酽，对外商品输出体系初具规模，这些都成为外商竞相涌入温州的诱因。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温州为商埠，开埠是温州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是温州社会遭受剧变、感受现代化冲击的里程碑。从那以后，温州开始在近世社会变迁的道路上愈行愈快。1877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委派英籍税务司好博逊（H. E. Hobson）筹设瓯海关，4月1日温州海关建立，温州港正式对外开放。同月，温沪航线开通，英国怡和洋行所属康克斯特（Conquest）客

¹胡珠生，温州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1页。

货轮从上海运棉布等洋货，首次驶抵温州，自此正式撬开了温州长久紧闭的大门。这艘开埠后首次造访温州港的外国商轮，毫不掩饰它所代表的国家对这个海滨之城的强烈觊觎之心，船名 Conquest 直译成中文就是赤裸裸的“征服”之意。这似乎是一个预兆，更多的外国商品、文化即将大量流入温州，猛烈摇撼温州固有的社会生态，既是主观上经济利益的钳制掠夺，也是客观上现代文明的收编整合。洋广局随后设立，进口洋货剧烈拷问着封建自给经济的低下效率，温州地方传统经济趋于没落。还是在同年4月，英国首任驻温领事阿尔巴斯特（L. Albaster）乘坐英舰莫斯克特（Mosquito）号抵温，设立临时领事馆于温州游览胜地——江心屿上的孟楼（也称浩然楼），先后统辖德国、西班牙、奥匈帝国、瑞典等国在温侨民及通商事务。

由于外力的强烈介入，晚清温州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诸方面的深刻转换，原有的制度架构、生活方式裂变，新生事物接踵出现，重构了温州的社会场域。

在政治上，港口、海关主权沦落，温州被迫敞开大门接纳寰宇各国。瓯海关建立后，好博逊一人独揽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权。他上任伊始，就积极部署外籍管理人员的落实到位。历览1877年到1926年大权在握的瓯海关税务司的名单，可发现：共有14任英国人，3任法国人，1任美国人，2任德国人，1任俄国人，唯独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留下。海关主权旁落他手，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上的不能自持和文化上的剧烈震荡。

在经济上，随着国内外航线的相继开辟，源源不断的洋货对固有经济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本土经济的脆弱性和积年痼疾在明晃晃的外来镜子面前暴露无遗。英国怡和洋行拔得头筹，率先在温州设立代理行，各国蜂拥而上，相继在温设立公司和商行，以摧天坼地之势在温倾销洋货，大肆掠夺廉价的土特产和原料。现代化的新鲜器物伴随着外国公司渗透进了寻常巷陌之间，逐渐改变了这座城市运行生息的整体生活底色：铁井栏（温州老街名，下同）出售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馒头巷出售英国卜内门公司的卜内门牌颜料、狮牌肥料、伞牌肥皂，英瑞炼乳公司的炼乳，还开了英国的太古保险公司，第一桥开了日本的乐洋堂百货店，墨池坊开了日本的三

井木炭公司，县后巷开了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等等。以至于“到了1900年，温州城内已成为‘瓯为海国，市半洋商’¹。洋商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奇便捷商品的诱惑，更为重要的是商品背后蕴含着的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文明制度。而这些都重构了温州城的社会生态。

文化上，外地见闻和西学的传入，更是影响深远，几乎彻底颠覆了温州土人沿袭了几千年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温沪航线开辟后，温州人坐船到上海、杭州方便了很多，从原来辗转取道丽水、金华的近半个月缩短至几天工夫。更多的人选择了往来于各大通商口岸之间，互通见识，敞开眼界，告别闭塞。温州港往来沿海通商口岸的旅客，1877年进出口为794人，七年后，于1882年攀升至3783人，1893年为4700人。²上海十里洋场的西方文明，令温州人眩晕不已。陈虬的挚友许启畴在刚开埠时乘轮船赴上海，撰诗赞美上海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化器物：“市楼四叠香成雾，电气千球月闪空。”宋恕《览月沪滨至静安寺》也说：“制电为灯照夜游”，“轮蹄十里长行乐”。³言辞之间，颇有神往艳羨之意。对西方文明中现代化器物的认同，也引起了温州人对西学的渴求之心。温州名士孙铿鸣要求儿孙们“兼习西学”，他当时任龙门书院山长，“慨然言于苏松太分巡，移取（江南制造局）局译西籍每种各一份存院”⁴，以开阔学生的新知疆界。陈虬的利济医学堂也注重介绍西方医学，其主办的《利济学堂报》更是转载了大量西方新闻。此时，温州的文化生态呈现为一种新旧杂糅、亮色频现的特殊格局：旧学犹存，新学乍兴，新旧抵牾，新旧交融。

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温州本土的信息消费方式也随之裂变，人们胸怀更加坦荡开放，更加强烈地渴望了解全国、全球，更加愿意从纷繁芜杂、变动不居的信息流中去把握时代的潮动。而这直接成为《利济学堂报》应运而生的传播土壤。由传教士傅兰雅主持的著名的近代科技月刊《格致汇编》创办于光绪二年，设有《互相问答》专栏，其第227号提问人是温州某君，问：“大雨过后，地面有鱼，大可盈尺，地面原不生鱼，鱼来何处？”

¹政协温州市鹿城区委文史组编，鹿城文史资料，第1辑，11页。

²周厚才，温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69页。

³胡珠生，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775页。

⁴胡珠生，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323页。

解疑释惑之：“旋风卷来。”¹可见，温州早已有入体认到科技期刊广见识、祛陋见的价值，积极订阅，并且踊跃参与知识提问，显示出对西方科学的浓烈兴趣与考求借鉴之意。而在维新变法时期，温州知识分子的信息需求更是高涨。自从孙诒让向上海订阅新闻报后，瑞安城内订报、助报之风盛行。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开办后，孙诒让带头捐赠100元，黄绍箕捐赠30元，右营守备阎仪韶捐赠10元，并在瑞安算计馆设立订报所，帮助《时务报》广开发行网络。时务报馆统计中小县城的订阅人数后发现：“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瑞安）为最多。”²这些都彰显出温州社会当时丰沛的信息消费需求和能力，向近世文明靠拢的温州人不再满足于僻壤一隅的零碎信息，他们将求知求变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袤的疆域，更为长远的将来，更为深远的层面。宋恕就在《卑议》里认为“西国之内治，至密也”，必须深明其要旨，学习其“良法美意”。西方整体文明架构有很多可资采撷、挪为己用之处：“西国官听民讼，许两造各请状师到堂”，“西国子壮则必析其产”，“西国最重医”，“西国最讲种植”，“西国法：开局售票以助要需”，“西国决犯有击脑、闭气诸法”，“西国女人皆识字，中国则绝少”³。可看出，宋恕对西方的法律、小家庭制、医学、农学、刑罚、政治、教育、男女平等诸方面都颇有探究效仿之意。这显然已跳出了洋务派只穷究于格致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窠臼，而更多地转向西政、西学层面。

第二节 晚清温州知识群落的具体描述

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矢志追索往往可以撑起一个时代的风骨。温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美誉，文化积淀醇厚醇实，医药之风蕴藉不衰。宋代即设有印书工场，雕版极为精雅，行至清朝末年，已具备相当殷厚的出版基础。晚清温州人文荟萃，巨擘云集，形成了很有温州特色的知识生态：以“东瓯三杰”（陈虬、陈黻宸、宋恕）、三孙（孙衣言、孙铨鸣、孙诒让）、五黄（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等为代表的温州学人，承袭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精神衣钵，注重经世济民、救时图强，主张知行

¹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46页。

²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汪康年与孙诒让书札。

³胡珠生，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11、21、34、36、22、26、17页。

合一、义利兼备。

南宋温州地区出现了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相抗之势的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以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人为个中翘楚，叶适集其大成。这个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道学家的空谈义理，对传统儒家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同时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这些思想不光在南宋，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史上也是闪烁着卓尔不群的睿智光芒的。

永嘉学派可谓绵泽悠远。几百年后，活跃在晚清温州社会舞台上的孙衣言（1817-1894）、孙铿鸣（1817-1901）、孙诒让（1848-1908）、陈虬（1851-1904）、陈黻宸（1859-1917）、宋恕（1862-1910）、黄体芳（1832-1899）、黄绍箕（1854-1908）、黄绍第（1855-1915）、黄庆澄（1863-1904）等鸿儒硕士，均受其影响浸润极深。这些温州学人均跳出了彼时甚嚣尘上的汉学、宋学的窠臼，接受魏源、冯桂芬等提倡的经世改革学说，重拾永嘉事功学派的精神文化遗产，积极致力于具有现代意味的地方文化建设。而乾嘉时期极为兴盛的汉学，又称考证学、朴学，主张砥砺发扬汉代经学家的研究方法，从训诂文字、考证文物典章制度入手，阐经释义。晚清不少学者因对国事阽危深感无望，故醉心于此，但温州学人大多不拘泥于该学，而力主将经世之学熔铸进其治学生涯之中去。

晚清温州知识分子织就了一张极富地方精神特质的文化生态网络。他们中不少人整理旧学，引进西学，关注国计民生，著述丰赡。陈虬的《治平通议》提供 44 项改革方案，最有特色的是其议院主张，发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创设议院的主张。宋恕提出“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设议院始”的“三始一始说”，其变法维新纲领《六字课斋卑议》以其惊世骇俗的改革主张而“开风气之先”。李鸿章、张謇、黄绍第、王韬、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俞樾、王修植等都读过宋氏《卑议》。谭嗣同誉之

为“后王师”，梁启超将其列入《西学书目表》。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谈到，后人认为《六字课斋卑议》在反映封建社会下层民众的痛苦和揭露斥责三纲五常封建理学的残暴虚伪方面，其许多论点“达到了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的思想高度”。

就连盛名于晚清的孙诒让，以其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领域的诸多撰述，被时人誉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代朴学宗师，他后来在时世驱策下也转而追索经世之学。《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读完北京友人寄来的《强学书局章程》，触痛心怀，尽管过去“于经世之学夙未究心”，但“睹此危局，靦然人面，不愿坐视夷灭”，决心“与寰宇同志”共同发起组织兴儒会。他坐而思，起而行，渐渐步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思想脉络更多地转向经世一端。

同时，温州学人重视实践探索，以知驭行，知行合一。1872年，陈虬、许启畴等26人倡议创办心兰书社，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雏形。1881年，陈虬、陈黻宸等人在瑞安城北槐吟馆成立乌托邦性质的求志社。甲午之役挫败后，温州学者更是积极进行自身知识思想体系的更新，全力响应维新派提出的“组织学会、兴办学校、设立报馆”的主张，积极介入社会事务。

第三节 戊戌变法时期温州传播版图的全面建构

一 报馆的新闻、科技传播：《利济学堂报》、《算学报》

1897年1月20日，陈虬在温州府前街出版半月刊《利济学堂报》，后在杭州贡院西桥（后设于经世报馆内）、宁波、兰溪、衢州等处筹设分馆，公开向全国大中城市发行，触角波及京津沪穗港澳等地。每册50页，共出16册。陈虬、宋恕还同章炳麟一起担任同年8月2日在杭州出版的《经世报》的主编和主笔。具体分析见第三章。

7月，温州平阳的黄庆澄也在温州府前街创办了最早的数学专门月刊《算学报》，从第2期起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设立分馆，并在时务报馆、

格致书室、六先书局、醉六堂等处设经营点。最初几期石印，后改为刻本。创刊宗旨在《布白》中展现为“冀为格致之权舆，以辟黄人之智慧”。每期约 1 万字，共出 12 期，不同于陈虬的师生齐力办报，该刊由黄一人鼎力操持。黄庆澄作为把关人，非常注重其传播效果的锻造，要求该刊“以阐明新理、纠正谬误为宗”，申明“其有浅近易知及陈庸无谓者，本报概不登录”。刊文内容相当于初等数学，行文通俗生动，应用题切合实用，并能深入浅出、注重图解，颇受当时读者欢迎，是我国最早的数学普及刊物。谭嗣同在致汪康年的书信中为此刊辩解：“《算报》或谓不佳，然首册皆言至浅者，实无从判断佳否。嗣同颇喜其不厌烦琐，甚便初学耳。或谓其抄袭，然首册仅及加减乘除，试思加减乘除何须抄袭，且亦不能另生一新法也。”¹可见，虽然《算学报》的科技传播还谈不上专业规范，但作为最早的数学刊物，它有意选择的低层切入、浅俗表达的“低开”操作策略，使得它在转型社会期间发挥了一定的科技传播的功效，获得了不少的支持资源。

二 学堂的教育传播：利济医学堂、瑞安算计馆、方言馆、蚕学馆

1885 年，陈虬、陈黻宸等创立浙南最早的新式医院——利济医院，随之创办中国最早的新式中医专门学校——利济医学堂，这也是第一所采用西方办学制度、运作方法的中医学校。后又在温州、永嘉、平阳等地接踵设立分校，19 年间共培养学生 300 多人。具体分析见后。

1895 年 11 月，孙诒让、黄绍箕、黄绍第等 9 人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改为瑞安算计馆。

1897 年，项崧和兄湘藻等在瑞安项氏宗祠举办方言馆，设东文、西文二班，学额各为 25 名，聘上海教习蔡华卿，月薪 100 元，孙诒让还委托汪康年代聘日本教习。同年春，孙诒让在永嘉创办蚕学馆，即蚕桑学堂，搜集历来中国种桑养蚕旧籍，兼以采用新译出版的法、意、日各国蚕桑学书作教材，附辟广场以供实验，改良蚕种。²

这些温州早期的新式学堂所进行的教育传播，取向已不同于旧式的私

¹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²胡珠生，温州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45 页。

塾书院，其教育传播更倾向于传播新知、新见、新学，并积极借助西学的利器，改革原有的教育格局，为温州维新浪潮的掀起培育出了众多生力军。

三 学会的政治、科技传播：兴儒会、瑞安务农支会

1895年，瑞安“三黄”列名发起上海强学会，黄绍箕参议《强学书局章程》。孙诒让“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发起组织兴儒会，撰写《兴儒会略例并叙》，建议京都设总会，各省设分会，募十万金为基金，诹访人材，投资工商业，举办卫商团练。但这个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组织，受挫于当时的社会体制，未能全面得以实施，仅有个别实际项目得以贯彻执行。¹

1897年，上海创设务农会。陈虬、洪炳文等16人加入该会成为会员。1898年1月，孙诒让、黄绍箕、黄绍第等39人集资组织瑞安务农支会。该学会的性质和宗旨在其《立案呈禀》上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略仿鄂、沪成规，自集股分以为经费，于本城设立务农会，购置附郭田园，试种湖桑瓠柑，略采欧美种植之方，以兴本邑自然之利。”²有会员50多人，办事组织分总理、司钱务、司种植、司笔墨、司采访等5项，购地40来亩作种植场。洪炳文在调研基础上撰写《瑞安农事述》、《瑞安土产述》、《温州茶述》、《瓯浆志略》等文寄送上海《农学报》发表。学会重视改良种子、肥料和耕作方法，有力促进地方农业发展。并认为地方农业突破藩篱求发展，“非农夫能为之也，皆习农学之士为之也”，深刻地体认到了农学专家在推进农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第二章 新闻传播视野下的《利济学堂报》及其内部形态

本章将从新闻学的视野来全面观照这份刊物。拟采取由人及刊、人刊合一的切入顺序，主要从陈虬个人的精神历程和刊物基本情况的考证两方面展开研究。

¹张宪文编，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²孙延钊编，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第3册，温州市图书馆藏原稿。

第一节 主要操作者陈虬的人生历程、精神轨迹

《利济学堂报》是戊戌温州卓然屹立的一支标杆，无论是其主要操作者的办报实践、人生旨归，还是刊物本身的内容诉求、传播倾向、地域影响力，都非常值得后世去考究。故本文选择将它作为该时期温州传播系统的卓越范本，加以深描式勾勒。

主办者是一份刊物的精神灵魂所系，刊如其人，报刊是其操刀者精神诉求和生命轨迹的表现载体。通过办刊的立言来达到立人的目的，是许多知识分子自觉的人生选择。陈虬的办刊实践，强烈浸渍着他个人的理想追索和精神旨归，因此在具体解读报刊文本前，有必要简单探究勾画一下他的人生历程和精神演绎之路。



陈虬，原名国珍，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温州瑞安人，祖籍乐清斗门，祖上从乐清迁居来瑞安已过十世，他依然自称“乐清陈虬”，终身未改。他与汤寿潜（字蛰仙）合称“浙东二蛰”，晚年经常与陈黻宸、宋恕同到瑞安演说会，并列讲席，时人冠之以“东瓯三杰”的美誉。

14岁时，陈虬就显露出日后图强的少年锐气和健硕品格。“稍长尤不羈，使酒负气，习拳棒，善泅水。见不平，叱咤用武，虽不敌不计。不屑屑于帖括，博览群籍，好说部，兼涉历、相、星命诸学。遇老师、宿儒，往往摘经史以难先生，于是得狂名。”¹

17岁时，出应试。长沙徐尚书树铭视浙学，见到陈虬的文章，手诏说：“尔文恢怪奇伟，他日当以文章横行一世！”陈虬受到鼓励，开始“始学词章，间复留心训诂”（《上东抚张宫保书》）。他在“二十以后，留心经世。施以过劳，得咯血不寐疾”（《上东抚张宫保书》）。青年患病的经历，使得他久病成医，反而走上岐黄之道。“虬自庚午患病，始有志于医”（《蛰

¹胡珠生，陈虬年谱，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庐诊录》)。

陈虬是当时受东西方糅杂的知识体系深切浸渍的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样本。尽管从小领受谨严整肃的旧式教育，在颠扑时局的震荡感召下，他却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体系、信念皈依进行了荡涤更新，汰弃了埋首于故纸堆、红氍毹中、穷究于考据、辨伪的汉学，摈斥了拘囿于“身心性命义理”的宋明理学，开始接受魏源等人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西方的民权思想，并积极地从先辈永嘉学派身上汲取进步因子。

陈虬渴望跳出汉宋两学的图囿，接触广袤的社会现实，践履切实的人生责任。他读《宋史·道学传》，每每对朱熹理学大吐不满之情，所赋七律有“康节图书皆赴影，考亭语录半禅机”之句。面对程朱经典训条“存天理，灭人欲”，他在《利济丛书总序》中予以了驳斥，提出应“通其俗，乐其利，在于给生人之欲。故人得其欲，则弱者不为虱与蠹，强者不为狼与豹”。他追古思今，以宋代先贤永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居，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矣”，其对永嘉学派的研究和评述，连一代大儒孙诒让（两人因见解枘凿，多有齟齬，终生不和）也喟叹“精当无匹”。（孙诒让《答陈子珊书》）

陈虬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氛围的濡养下自觉发生了转捩，他的身上闪耀着新式知识分子契合时代脉动的“变易”精神、从旧阵营中决然退出的勇贲姿态。在陈虬的精神吐纳中，有着极其浓烈的力主“变易”的思想大端，这从他的政治著作和医学著作中，都可显明窥见之。

宋代以后的哲学家里面，王船山将变异解析得最为透彻。而陈虬的变易观又再上高阶，他视域广阔，心系寰宇，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传统之变，而开始向维新时代的进化论史观过渡。他以自身的临医实践做形象比照，力主按照“经世”的目的而变法，认为“世移时易，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殍子矣。”¹他又用心良苦，力主为“救时”而变法：“国家自通商以来，局又大变，华夷杂处，巧力相尚，有未可概以儒术治者。则诸子近法亦将有取焉。夫良剑期乎断，不期乎莫邪；良马期于千里，不期乎骥骜。循表而导溺，契舟以

¹胡珠生，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6页。

求剑，自谓能法古，不知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乌在其能儒也！”¹从中皆能读出陈虬与时俱进的变易观念。

饱受旧式体制营养的浸染，但陈虬身上依然有很多西方民权思想的印记。他在编辑《利济学堂报》时博征旁引，摘录西报上的内容，主张从制度层面而不仅仅是洋务派提倡的器物层面去学习西方。他本人就极其重视言论自由，有“在上有政权、有教权，在下有言权”的精彩论断，力主“广言路”，扩大民权，求富于民，以黔黎兆庶之强健来支撑起国家强盛的脊骨，在《利济学堂报》上曾作《言权》上下、《论国之强弱系于民心，民心之向背系于州县，宜以州县的民为强国之本》等文，皆能切中肯綮，立论高远。

陈虬的挚友宋恕在其入京会试时，曾赋诗一首《燕都篇——赠陈志三孝廉虬入都也》为其送行，也在诗中很好地缕析了好友的治学端绪：“斟酌古今采欧美，更改制度活黎元。永嘉旧学大施展，水心、君举慰惊魂！”（永嘉学派中两位扛其大鼎者，陈傅良字君举，叶适人称水心先生）指出了其思想并行不悖的两大端：永嘉事功之学和西方开明政学。

1890年，陈虬赴京会试，归途中向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八条革新去弊的条陈，这是他试图将社会改革的设想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其第一条为“创设议院以通下情”。他率先提出开议院，被认为是早期维新派的卓越代表。“泰西各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顾其制繁重，中国猝难仿行。宜变通其法，令各直省札飭州院，一例创设议院。”具体的议院主张为：在中央“设都察院衙门，主以三公，中设议员三十六人，每部各六，不拘品级，任官公举练达者。国有大事，议定始行。”在地方，“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凡荐辟、刑杀人，皆先状其事实行于议院，有不实不尽者改正。又设巡检一，秩视判官，巡视境内，检举利弊以达于县，县再下议院。”²他的议院观是在封建土壤上滋养出来的，带着浓重的对传统机制的惯性依附味道，与真正的西方议院观相去甚远，但他对封建桎梏中监督权、参政权、民主性的追求，在当时仍有平地起惊雷之效。

1897年1月20日，陈虬出版第一册《利济学堂报》，除了医学独详之

¹胡珠生，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6页。

²胡珠生，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1页。

外，这也是一份鼓噪变法的重要维新报刊。

1897年8月2日，童学琦、胡道南创办《经世报》于杭州，延聘陈虬为主笔。此刊欲以春秋大义治理世事，其宗旨为依托古制，言政言教，宣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介绍新知识、新学术。第一册《经世报例言》就明示：“愿与各新报翕效嚶鸣，自固气类，隐存《春秋》经世之责，无忘同舟共济之怀。”趁虬再得立言渠道，于其上发表了多篇重要政论，在第一册上刊有《经世报序》和《论报馆足翊政教》二文，在第二至十六册又接续发表《论外交得失》等八篇文章，皆是纵论国是民瘼，提供变革良方。

1898年4月，陈虬赴京会试，和章献猷共同列名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¹，为首梁启超，共有184人题名，陈虬下署“浙江乐清”，章献猷下署“浙江瑞安”，可见其对维新大业的支持是全心鼎力的，而非仅仅流于书面呼求形式。

《保国会章程》第11条规定：“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届设分会，以地名冠之。”陈虬深领康有为的号召之意，与蔡元培等参与发起组织保国会的浙江分会——保浙会，并为首呈请总署代奏《请开保浙会公呈》，并拟定“治乡团以杜乱萌”、“设学堂以开民智”、“兴矿务以裕利源”等三策“以供堯采”。四月廿一日（6月9日）出版的澳门《知新报》第55册和《湘报》第106号同时登出《浙江孝廉陈虬等呈请总署代奏折稿》，可为明证。陈虬在公呈中赫然提出“窃维自强之道在厚植民力以固人心，大旨当以富强为主”，“为今之计，宜大假民权，许其联集干事绅富，通筹全省富强之计，分门办理”。均可从中窥见其重视民间草根力量和地方开发建设的昭昭之心。

陈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妇女解放等思想方面多有宏言谠论的阐发。1893年12月，他出版了《治平通议》一书，包括《经世博议》4卷、《救时要议》1卷、《东游条议》1卷、《治平三议》1卷、《蜚庐文略》1卷，共8卷，由瓯雅堂出版。两江总督张之洞对《治平通议》对此书嘉许不已，“见陈氏《通议》而大悦，渴欲接谈”²，梁启超把它列入了《西学书目表》，宋恕则写文加以评论，该书到解放后仍被选录到《中

¹戊戌变法，中国史学会编，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03页。

²胡珠生，宋恕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93，537页。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之中。

简单描摹陈虬的政治、思想轨迹，可知他的一生始终处在赍张年代的前沿，同社会新潮严密接榫，这种开拓求索式的人生姿态决定了其所办报纸清新奋发、切中时代肯綮的面向。

陈虬不仅是近代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大儒和政治呼告者，同时又是一位身有专长的悬壶济世者，对传统中医造诣颇深，对新式西方医学亦有涉猎，且胸襟疏阔，提倡中西医利弊互见，取长补短，无愧于温州代兴不衰的医学风潮的催生者之一。这种人生锐锋使得他能够积极运用所长，打造砥砺社会智识、传播昌明科技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具体有三：医院、学堂、报馆。1884年，他写成了我国第一份建立中医院和中医学校的翔实计划——《医院议》。1885年，他与陈黻宸、何迪启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合资创办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广揽生徒，培训医生。1895年，在温州小高桥设立分院，在周宅祠巷设利济分院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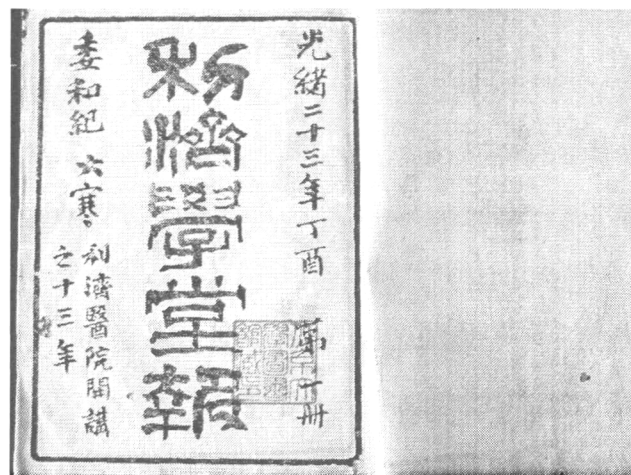
从上述脉络的梳理中可见出，陈虬思想的两大理论基础体现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变易”的进化史观；抨击汉学（考据）和宋学（理学），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其政治思想在甲午前后发生重大转捩，从“中体西用”思想体系、“变器不变道”的传统道器观，转变到开始接受西方民权思想，脱离洋务思想转向维新思潮。他认识到：变法的关键在于政学，而非商兵；君主专制统治导致严重的民族危机，提出了包含有地方自立因素有的分镇救时要策；主张开通民智，开讲堂，兴学校，实行文字改革。而这些思想火花，在他倾尽心血主持的《利济学堂报》中皆有清晰的体现，他的办报也正是为了实践这些人生的诉求。

第二节 该刊内部形态及特点

本论文将从原始第一手文献的研究（刊文、告白、《报例》）出发，考证该刊的外部形态、编辑特色、组织建制、出版发行、传播渠道的偏倚性、内容的两种面向（维新、学术）、报导原则、经营开发、影响空间、停刊原因等方面，厘清概貌。考究过程中，将本着“无信不征”和尊重原籍的原则，逐一展开探讨。

一 外部形态

该刊为木刻本，用七刀官堆纸印，后改用连史纸，线装成册，每月两册，每册约 50 页，通页竖排。《汇编》第一册的“本馆告白”言：“本报去冬集股开办，原议版参活字，纸用七刀官堆出报，后颇蒙远近奖借，重议全刊木版，岁增刻资千余



金。本郡报价议收八五，如有定印连史白纸，每分加宝银六角出各册，一例换补，不另取资。”在发行日期的设计上，则很有乡土中国的朴拙气息，遵医历二十四节气日为定期出刊日。比如 1897 年 1 月 20 日创刊那期封面上便有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大寒日）的字样。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发刊，还是同主编提倡的中医学术根柢息息相关，陈虬的医论体系强调五运六气，视运气为医学之本，《报例》尝言：“本报遵医历二十四节气日出版，每月两册，每册约五十页。报始今岁大寒日，以明年十二月小寒日为一纪。盖五运六气皆始于大寒也。年共二十四册。”半月刊，全年二十四册，年定价为大洋四元。《报例》中载：“售阅本报者，全年每份大银圆四元，预付报资，不准拆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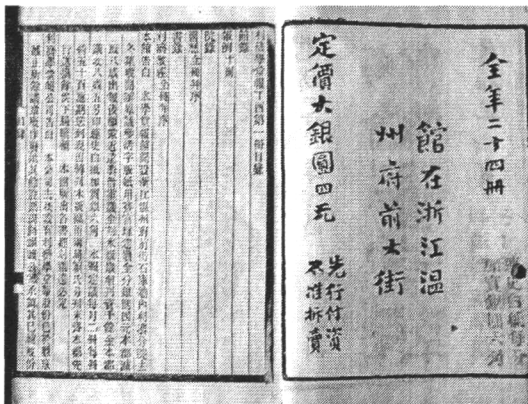
之所以取名叫《学堂报》，主要是刊物本身是依附于医学堂而设立的。《报例》云：“本报即从积岁会讲语录编辑成帙，因取古人报最、报政之义，列为《学堂报》。”

从出版形态上来分析对比项，该刊尽管身居僻壤穷陋，但其大致样态完全不逊色于当时树立时代风范的煌煌大刊们。据笔者统汇，被戈公振认为的当时“三足鼎立”的三种期刊样态是：1896 年 8 月 9 日上海出版的《时务报》为旬刊，书本式，连史纸石印，每期 20 页，约 3 万至 4 万字；1897 年 1 月 21 日澳门出版的《知新报》为旬刊，每册约 15 页，杭连纸铅印；1897 年 3 月长沙校经书院出版的《湘学新报》为旬刊，每册约 40 页，木刻连史纸印。另外，1897 年 4 月上海出版的农学期刊之发轫——《农学报》

为半月刊，每册约 25 页，连史纸石印。1898 年 10 月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为旬刊，书本式，连史纸印刷，每期 30-40 页，3 万多字。

从中反映出，当时维新运动的狂澜已经奔腾涌泻进东南沿海的中小城市，进步报刊的面貌惊人相似。同时也可以约略感受到，正是由于利济医院的充裕医润、学堂的积年学费、社会贤达慷慨捐资的支持挹注，中等城市的期刊才能采用彼时先进的出版技术。利济全方位立体传播系统（医院、学堂、药店、报馆）的精诚打造从一开始就为该刊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给养，使其能够卸下诸多早期报刊的辎重，稳健地按照自身的机理成长壮大。经济独立健全对报刊起支撑作用这一朴素真理，从中也可得到印证。

二 编辑特色



该刊的编排也较有特色，清晰醒目，有章可循。首页设目录，提纲挈领，间或择取重要新闻、论说做一强调导引，提供值得重点阅读的知识索引地图。每期设固定大专栏：文录、院录、书录、报录，大专栏下统筹不固定的小

专栏。文录下设医论、政论、各小专栏的开栏弁言、汇编总序等，院录中载医院的学堂教条、习医章程、利济讲义等，书录下设利济元经、利济卫生经、医历答问、教经答问、算纬前编、中星图略等，报录下辟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利济外乘、学蓓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见闻近录、近政备考、格致卮言、经世文传等小专栏，每期不固定设几个小专栏。编辑上突出重点，收揽重要的医论、政论、时论三四篇置于其首的文录，多为利济师生、地方士绅所作，有须作说明导引的，则在目录中载编者语或作者注。“报录”后附告白。题材丰富多样，兼容并蓄，有：论说、报道、电文、奏折、报章文摘、译稿、课堂教材等。

第 4 册后开始附“本报刊误”，校正谬误，巨细靡遗，诚恳扎实，体现出编者拾遗补阙的“把关人”意识、对读者和内容负责的拳拳之心。把

关人理论告诉我们，传媒组织（包括传播组织和组织化了的个人）决定什么样的传播内容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它是传播过程的首端，也是传播行为能够得以发生的基础。从该刊的具体运作上，可以看到其对整体报刊质量的严密把关。

三 组织建制

下面探究其媒介组织的内部架构、人员设置。在《汇编一》中，有“利济医院学堂春季办事姓氏”、“利济医院学堂夏季办事姓氏”、“利济医院学堂秋季办事姓氏”、“利济医院学堂冬季办事姓氏”的记载。尽管罗列的是医院学堂的人员设置，但利济传播系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基本上办医院学堂的人员与办报群落是重叠的。如这些列表中都提及了撰稿（述）、总校、分校、襄订、纂修、校字等职位，显然是为期刊的运行所设。而且考察主要办刊者的社会活动，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医学实践、教育实践、办刊实践大多相行不悖，无一偏废。如医院院长陈虬，教习陈葆善、陈侠，监院池志澄（直接主持杭州的分报馆），学生陈明、周焕枢、何炯等，都直接参与了期刊的运作，或为经营管理者，或为主要撰稿人。因此，不妨从医院学堂的人员设置来窥知报馆的人员情况。春季办事人员有 17 人，夏季办事人员骤升至 52 人（姚远在《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中、金日红在《利济医学堂始末及教学概况》中都认为，其报馆前后参与编辑出版者多达 52 人；胡滨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浙江中医界》一文中，认为该刊设人员 51 人，因此这种重叠、类推计算人数的方法是大致可行的），人数扩充了整整 3 倍，职位设置更为分化、细化，还增加了来啊面貌呈现更加丰富多元。该刊新开的栏目接踵而起，人数的大幅度攀升还难以应对骤增的业务，夏季列表中已经出现了人员兼职现象，如总理陈国琳兼襄订，协理叶麟风兼总校，51 人中有 10 人都拨冗身兼两职，显见报馆发展的渐入佳境、业务的赳赳日上、机构的日益建制化。利济系统的高层建制为：陈黻宸（介石）、何迪启（志石）担任院董，陈虬为院长兼主编。秋季编撰人员 49 人，冬季编撰人员依然保持在同样的 49 人，可见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报馆已稳定自身的建制，建立起一套熟稔操作报馆运作的人

员体系，这也是该刊在实践摸索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该刊的人员配置上还存在着一大特色：学堂学生利用办刊实现身份转换，由单纯求学者而成为集科研者、社会传教者和办刊者三位一体的复合角色。不少医论、政论是由学生有感而发撰写的，如池志澄《书治平通议弛女足章后》就是他在学习陈虬的《治平通议》后的感言；不少外稿是由学生充任编辑而择取的；甚至其上还连载有学生撰写的《利济卫生经》、《算纬前编》等个人研究之作。利济医学堂也借由该刊从关门授徒的传统学堂，而一跃成为社会公共教育机关。

四 出版发行

再来分析一下该刊的发行情况，发行范围和数量是该刊生发影响力的重要因子。《汇编一》中刊布有“利济学堂报夏季售报处所”和其后的“各处代售本报处所”、“续增各处派报处所”。代派报处是该刊驻扎各地的总经销处，这些小据点分布的广度、密度、数量真切地反映了其市场容量和开拓报刊生存空间的能力，可以借其管窥当时该刊的真实生态状况。拟从以下诸方面来品析。

（一）从传播地理学的视角，大致描摹该刊的传播路径和辐射畛域。

“夏季售报处”中，该刊的派报点不出浙江省的范围，最远到达杭州（下城贡院西桥本分馆、上扇子巷经世报馆），以及浙北的湖州（安定书院）等。而在厥后的派报处中，已可以焯明见到传播路径的辐射拓展，向北推进至上海（英租界石路时务报馆、英界新关后长乐里源兴隆茶栈、咸瓜街阜昌参号、梅福里农会报馆等）、天津（城内估衣街清秘阁南纸店），向西推进至九江（三牌楼郑公馆）、武汉（汉口大夹街源昌丝行、黄陂街简启祥漆行、武昌武备学堂等），向南推进至福建（藩司前王公馆、南台上杭街应大同烟栈）、广东（双门底叶公馆），甚至迂回逶迤到了澳门（知新报馆）。在短短数月中，这种传播版图的扩散建构，不可小觑，个中原因值得品嚼。笔者认为，这种快速传播影映了当时社会上时人趋之、如饮狂泉的思想氛围，因该刊从一开始，就浓彩重墨地带上了维新的进步色泽，同时代脉动有力接轨了。

（二）估算大概的发行量，以评测其社会影响力。编者苦心孤诣的出版物，只有被消费被阅读，传而致通，才能谈得上影响力和教化、引导功能的发挥。那时并没有报刊发行量的稽查体系，笔者结合《报例》所言，约略估计之：“无论本郡外省，如蒙交好，代售本报至十分以上者，按照二成另送本报若干分；二十分以上，并将姓氏、爵里列报，以志勿谖。”在“夏季售报处”里登载了44处代售点的姓氏爵里，假设代售该刊10份以上不到20份的地点（不登报）有一半22处，该报夏季的发行量最少在1100份以上。同样推演之，其后设立了92处至少售报20份以上的派报处，再加上未能登报的小派报点，该刊的发行量应至少在2500份以上。

（三）品嚼出该刊的支持体系和政治倾向性。代为发行、助其推广的派报处中，有几处耐人寻味：杭州上扇子巷经世报馆（如前述）、上海时务报馆（无疑为全国维新思想的孕生母体和发动机）、集成报馆（于1897年5月6日由陈念萱创刊，以采录中外各报为主的文摘报纸，在上海所有华文报刊拒登《京都保国会章程》一文时，而予以全文刊载，不忝为上海报界最坚定的戊戌变法支持者）、农会报馆（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戊戌变法期间发行的报刊中寿命最长的一家，农学会所创办的机关报，而农学会为1896年梁启超、谭嗣同、罗振玉、蒋伯斧等在上海成立，宣传“农学为富国之本”）、澳门知新报馆（于《利济》成立次日1月21日创刊，变法失败后，成为保皇会在澳门的机关刊物，积极联络当地殷富华侨何穗田等人开展勤王运动）等。陈虬在1897年5月15日致汪康年的书信中就流露出请其代为推介报纸、以广报路的积极意向：“拟午节后四处远售，当呈大教，彼时还望大力广销！”这不仅体现了报界同侪的提携良善之举，更潜隐地渗透出了该刊运行的底色，它在政治占位上和那些当时大力鼓吹变法、传输新知的报刊是基本一致的。

（四）分析其传播渠道的偏倚特性。在夏季44处和之后的92处售报点中，各相迥异的发行渠道糅杂交织，笔者进行类目建构，将它们一一纳入6种范畴：利济本系统（包括利济医院、学堂、报馆、药房及各地分院分馆），私人传播渠道（大多为开明之士、社会显达，属于社会中上层阶级），文教传播系统（包括书院、书坊、书斋、书室等），商业传播系统

（包括药行、茶栈、茶行、染坊、参号、南货店、银楼、靛青行、南纸店、丝行、烟栈、漆行、墨庄等各行各业的众生相、浮世图），政府部门（包括账捐局、轮船局、捕署等），其他报馆（杭州经世报馆、上海时务报馆、上海农会报馆、澳门知新报馆等）。统计结果见表一和表二。

表 1：夏季传播渠道分布情况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Summer Dissemination Channel

利济 本系统	私人 传播渠道	文教 传播系统	商业 传播系统	政府部门	其他报馆
8	15	8	9	3	1

表 2：其后传播渠道分布情况

Tab.2 The Distribution of Later Dissemination Channel

利济 本系统	私人 传播渠道	文教 传播系统	商业 传播系统	政府部门	其他报馆
4	31	9	30	2	3

从两个传播网络的分布状况看，该刊偏倚借重于私人传播渠道（分别占 34%和 39%）与商业传播系统（分别占 21%和 38%），有着彰明较著的渠道倾向性。可以见出：19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社会新潮刚牖启，壅塞愚顽之气刚行祛魅，言禁钳制的铁板一块刚开始销蚀，大众传播体系尚未架构，信息传布的途径还是相当落后萎缩的。民间自办报刊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托于办报者及其支持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即：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必须借力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这考验着办报者的交游范围和社会声望，所以大凡办刊者多为社会贤达人士，只有他们才能聚纳到最大可能的资源以开报路。同时可窥见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紧密相关性，人际传播的诸多场所为早期大众传播提供了一种群体接受的有效终端。

商业传播系统被广为用来扩容刊物发行，这与瓯越素重商贾、推行商道的社会风习相契合。南宋时期，温州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突破空谈心性的理学风气，主张学以致用、忧世务实。陈虬领悟并淬砺了这一精神脉络，他以永嘉事功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来勸勉己身，在《治平通议》的卷首序中披露心迹，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矣”，并

在经济思想上多有阐发，在地方建设体系的建构中提出了不少良策，被王修植盛誉为“非近来貌称经济学家所及”¹。1884年，他在瑞安利济堂撰成《善举尽可计利以图扩充说》一文，认为“以财分人，愈分则愈少”，故反对“为善不可计利之说”，主张医院、义渡、婴堂、借钱局等善举应开常捐，收工价，“开办之始则尽可权其子母以为久远之计”。在当时政府不可能将这些善举纳入公共财政予以补助的公益性事业的情况下，陈虬为使善举绵泽悠久，常兴不衰，遂从经济累利的角度出发来设计方案，体现了他富于远见卓识的经营意识，也符合他终身实践的事功学派的“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诉求。随着温沪航线的开通、洋广局的设立，进出口贸易大兴，茶叶、雨伞、瓯柑、木板、瓯绸、明矾和药材等传统产品输出量大增，“合郡出口之货以药材、茶、矾、瓯柑为四大宗，岁约百数万金”，同时也面临着外资争利、侵利的严峻局面。1889年，陈虬撰写《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后收录于《治平通议·蛰庐文略》中），建议“一切出口货物皆分设公司，郡城、上海各设一局”，并主张“聘请谙练茶师先于郡局自行严拣，分等装箱，务使瓯茶着实可靠”，以在出口博弈中增强自身议价筹码，保护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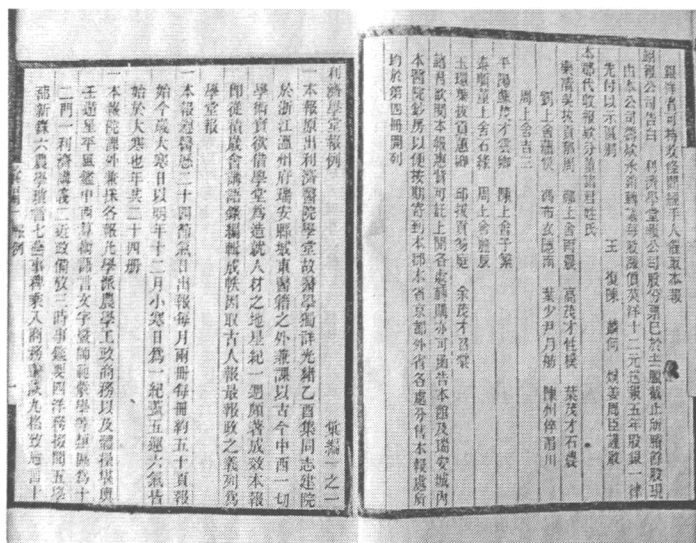
而在报刊发行渠道的借力中，他自然也顺延长久以来形成的经营意识，善用商途来拓展报途。这表明他因势利导，充分体认到了地方特质和民间资源，并较好地利用了社会环境中业已畅通的传播条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当时大报倚重的官报网络的簇新发行之路。

质言之，尽管该刊还没有建立起自办发行的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尚处于人际性、经验性、随意性较强的探索发行阶段，而这主要受系于当时整体社会环境的掣肘，但主创人员投眸重视民间，善用各种资源拓开言路，不失为一种令人感铭的可贵尝试。

¹胡珠生，宋恕师友函札，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

五 内容的两种面向

再来浅析其内容的双重面向。着重可以从《利济学堂报报例》中去窥知。《报例》相当于办刊的告白书、自我诚勉书，其上显示了主办人员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和对日后报刊具体操作路径的规划设计，对一份刊物的



自我定位具有指向标的意味，足资品鉴。办刊的初衷在《报例》中有所袒示：“医籍之外兼课以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才之地。”从内容看，作为第一份医学学报¹，《利济学堂报》立足于传播医学新知，规范业界操作惯习，倡扬理性缜密风气，配合医院学堂建设，它确实有相当篇幅聚焦于医学论著，其上出现了一大批见解精湛的专业文章。《报例》尝定：“本报原出利济医院学堂，故医学独详。”

但实际上医学学术和教育只是它的一大面向，它所承载的分量远比单纯学报要厚实沉潜得多。从《报例》上可以探知，该刊的内容用现代版块理念去厘清，可归纳为十二门，其中仅“利济讲义”属医，如其上曾条分缕析地刊载有《元经宝要》、《习医章程》、《丁酉医历史表》、《医历史问》等，后结集付梓为《利济丛书》。《报例》载：“本报院课外，兼采各报。凡学派、农学、工政、商务以及体操、堪輿、壬遁、星平、风鉴、中西算术、语言文字暨师范、蒙学等类，区为十二门：一、利济讲义，二、近政备考，三、时事鉴要，四、洋务掇闻，五、学葩新录，六、农学琐言，七、艺事稗乘，八、商务丛谈，九、格致卮言，十、见闻近录，十一、利济外乘，十二、经世文传。各自为页，随报分编，以便阅报诸君将来装订成帙。”

¹学报的意涵，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狭义上指的是由高校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这里取广义上的意涵，即由学府编辑出版的学术期刊。

可见，另外十一门又构成了该刊的另一面向和旨趣，显示出其卓犖大端还是鼓吹变法维新的新闻报道、文献汇编、新知介绍。《报例》也言以“学术、时务”两大面向来招徕有心读者：“本报虽宗旨有在，其于学术、时务实亦不无小补，谅有心世道者所乐共为提倡也。”

这种厘定需要历史的旁证，不妨参详一下陈虬自己的界清。他在致《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敝报改刻已出四册，敬寄奉三十份。宗旨虽出于医，而推广义类，针起聳聳之意，猥与贵报变法、论学相与经纬。”¹由此关照，《利济学堂报》不仅是一份医学专业学报，为中国高校科技学报之发轫，力主“论学”，更是政治性和综合性意味浓烈的维新时报，力主“变法”。

此外还可以看一下当时报界同侪对该刊的评价。1897年8月创刊的《经世报》的《序例》中就冠该刊以“新报”称谓，并将其与当时几大维新重镇报刊相提并论：“新报骤起，若上海之《时务》、澳门之《知新》、湖南之《湘学》、温州之《利济》。”²从中可知该刊所处阵营赋予它的身份标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医学学报的范畴中去探究它的话，那实在不利于其丰富内涵的全面展示。

接下来具体探究一下该刊各期的出版情况。除了光绪二十二年大寒（1897年1月20日）出版的第1期内容设置有稍异之处外，其余15期内容设置皆循同脉，一以贯之，这表明操作者对该刊的运作设计已经过缜密思量、有效设计，也表明该刊已脱离早期不定期出版报刊的内容设置碎片化、随意化的实践路径，开始向规范化、建制化、有序化、专业化的方向行进。

第1期设置有馆录、院录、书录三大栏：馆录一栏，刊载《利济学堂报例》，阐明总括其编辑方针和办刊理念，前文已详尽剖析；院录一栏，刊载《医历》；书录一栏刊有《利济教经》。另15期的结构井然有序，已形成固定样式：第2期至第8期设为文录+院录+书录+报录，第9期至第16期设为文录+书录+报录。

文录大栏下每期3篇文章，由各小栏目、书籍的序、政论、医论构成，其中序（叙）有13篇，政论有25篇，医论有7篇，大多为瓯越进步人士

¹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01页。

²见《经世报》第1册。

撰写，很多是由利济医学堂的师生执笔的。第2期续延至第8期的院录大栏下有1-2篇文章，其中第2期有2篇，为《利济医院习医章程》和《利济讲义》，第3期至第8期有1篇连载的《利济讲义》，提炼出全方位课堂教学的精华（不只是医学教育），以飨读者，从而将学校教育资源拓展成大众教育利器。书录一大栏下每期刊登3-5本连载书籍的内容，有陈虬撰写的《利济元经》、《医历答问》、《教经答问》、《中星图略》、《蝥庐诊录》，其学堂学生张烈撰写的《利济卫生经》，学生陈侠编写的《算纬前编》。报录大栏下有12个逐渐设立的小栏目，主要是选录它报同一畛域的内容，列为一栏，每栏开栏时皆由陈虬本人或其学生在文录一栏发表弁言，以明各栏要旨和设置初衷。第2期报录下设置有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部新录、艺事稗乘、见闻近录、近政备考、利济外乘、经世文传8个小专栏，第3期增加商务丛谈一栏，第6期增加农学琐言一栏，第9期增加格致卮言一栏。可见其新闻传播的版图是逐步建构、逐步饱满起来的，在这个趋向丰富的过程中，也可体会出办刊者对当时读者需求和社会热点的切切惓惓的不断深入把握。

六 新闻选录分析

《利济学堂报》在报录一大栏下逐渐设置了12个小专栏，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和地域限制，它没有像京沪报纸那样形成自己的采编新闻，刊上的新闻全部转录自它报。但从这些二次传播中，也可品味出一些它的报刊编辑旨趣来。

作为综合性的新闻期刊，该刊的新闻版图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在“报录”大专栏下，“时事鉴要”小专栏选录了137篇国内时政新闻，如矿务设局、会办东省铁路、福州船政、总署易名、停捐近闻、瓯郡邮章等。“洋务掇闻”刊载了国际新闻以及洋务自强运动中民族工商业、军矿业发展的184篇新闻，如：英德修睦、欧洲外交政策、银行倒闭、法国海军等次、苛待亚人、创造铁路始末、水师更议等。“学部新录”刊载了73篇文教新闻，如：武备学堂记闻、浙兴西学、商业学校、师范学堂记事、女立大学等。“农学琐言”转载了33篇农艺、农情新闻，如：电气利农、

椰树利厚、臭腐神奇、日本议察中国蚕桑、粤东蚕兆等。“艺事稗乘”转载了 70 则科技、工艺新闻，如：考工记、水底脚车、救火新船、创办纺织、钱厂新机、天上行车、西人造纸、摄声新器等。“商务丛谈”转载了 121 则经济新闻，如：铸钱开局、富国报言、蜀中市钱、商务公会、香港商务、比较日货、苏埠日兴等。“见闻近录”转载了 222 则新鲜、新奇、新颖的国内外社会新闻，如：调剂冷暖、造雨奇闻、女可举士、剪发新政、英国奢侈、国王俸数、妃嫔谋弑、怪雨行空、小岛观风等。“格致卮言”转载了 11 则体现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科技新闻，如：测验新说、炼石成金、光学植物。“利济外乘”刊载了 31 则国外医药卫生新闻，如：伦敦医案、医学通神、官设医学、仰光异人、药浆广种、孟买疫耗、西医论古等。“近政备考”一栏共择取了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总理衙门《覆奏洋商改造土货折》等 21 件奏折，“经世文传”一栏共选择了文廷式《条陈养民事宜折》、姚文楨《禀北洋大臣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议》等文章 20 篇，后两栏的设立颇类似于当时的官方报纸。

此多的报导、章程、奏折、议论皆各有偏重，已形成一种原始粗糙的版块理念，且各有侧重。比如《近政备考叙》里指出其设立的要旨在于：“蒙于体国经野之规，治军理财之道，尊内攘外之策，导民成俗之方，汇为一编，名曰近政备考。治术、学术庶有所裨！”表明该栏追求济世良治方案，以有利于政治改良与学术精进。而《农学琐言叙》中则流露出对西方农艺农制的向往和振兴中土农业、夯实国家富强之本、同外国展开逐利竞争的愿望：“环球巨利，百谷为首。豕狗树艺，国将萎瘁。西土先觉，申明兹道；上设农部，则巨责乃有专司；中开农会，则风气自能大畅；下建农院，则新理于焉日出。吁嗟我夏！稼穡维艰。耕敛不足，补助乏闻。荒歉一遇，饿殍载途。振作稍缓，斯艺恐枯。近日报章，率多议及。录辑其要，不无裨补。一则可以兴中华固有之利权，一则可以敌外洋勃起之商务，斯亦有志之士所乐观乎！”

难能可贵的是其新闻选录，颇具注目全球的世界眼光，不愿意囿于一时一地一隅。第八册后的该刊视阈广阔纵横，无类中西，译文遽增，大量新闻、知识性文章皆转译或移录自外报外刊。如：《德国军报》、《法文西

报》、《巴黎辩论日报》、《叻报》、《东京日日报》、《彼得堡时报》、《日本邮报》、《巴黎时报》、《斯当大报》、《德国哥仑报》、《伦敦朝邮报》、《美国无师工艺报》、《伦敦工艺格致报》、《纽约格致报》、《越南海防捷报》、《英国商务报》、《木司寇新闻报》等。这种国际视野对于报刊改良精进内容、扩大消息来源、同国外同侪互见利弊、撮其精华丰穰处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 16 期“洋务掇闻”栏下有《地下铁路》：“美国纽约现在正开凿地下铁路，总长度 42 英里，总投资 5000 万美元。火车通行的地下隧道，宽 26 英尺，高 20 英尺。机车往返采用双轨制，每分钟可运载乘客 340 人。”可见，当时该刊就已关注到地铁这种在美国尚属新奇事物的现代化公用设施，视阈之宏大广阔，可称得上心系寰宇，尽纳八荒。

第 13 期“见闻近录”栏下报道了刚出现的国外新鲜事物“破冰船”——《破冰新法》：“俄国最近向其邻国丹麦订造了一艘破冰轮船，造成后由丹麦直接驶往珲春。此船马力 4000 匹，破冰之法是凭借巨大的马力和重量将坚冰破碎，为商轮、客轮开航道。”这种在世纪之交对西方最新技术的紧密跟进报道，使得该刊远远走在了时代更迭的前潮，尤其凸显其广袤视野，以致令后人垂目感喟不已。作家王树增在获得如潮佳评“细微之处描述历史，彻察丝缕而又探求大势”的《1901 年：一个帝国的背影》一书中《外国的月亮》一节中，就以《利济》报道地铁和破冰船为例，来说明“报纸上刊登的一浪又一浪的报道热潮令一向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帝国文人们心慌 意乱，坐卧不宁¹”。

从受众阅读报章、接受新闻的动机心理来分析，该刊较好地平衡了信息引导和娱乐情感的两大吸引力维度。“引导的维度着眼于信息的供给，娱乐的维度着眼于情感的共鸣。”²劳伦斯·维纳“使用与满足”的两个维度，也可以描绘出该刊令读者“心向往之”的满足地图：一个是内容的维度，即内容的满足或回报，主要来自于认知行为，“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葩新录”、“艺事稗乘”等栏“信息的使用，是为了获得知识，增加或减少对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支持现存信念体系（如维

¹王树增，1901 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4。

²龚新琼，论新闻吸引力的两个维度，新闻与传播，2007，4。

新变法信念)”¹。另一个是过程的维度，过程的满足主要牵及情感或情绪，“见闻近录”以及“利济外乘”中一些逸闻奇事、趣说杂谈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刊的可读性。

该刊的时事新闻多数来自当时信息翔实的大报，如《申报》、《商务报》、《新闻报》、《沪报》、《知新报》、《万国公报》、《集成报》等，自采的地方新闻较少。这应是身处蕞尔小邑的报刊极其有限的采编力量导致的，早期报刊多有这种情况，“上海、新加坡等地报纸渐兴，互相转录，材料遂不虞缺乏”²，大城报刊尚且信息贫瘠，需要仰仗它报资源，更遑论小城报刊采摘信息的艰辛程度。

七 编辑方针：信诚

值得后辈体恤感怀的是，该刊在新闻信息采集备受掣肘的情况下，依然严守信诚原则，重视消息来源的权威可靠性和内容源流的交代，“以示有据”。《报例》规定：“本报凡录各报全文者，注明曰：‘录某月日某报’。删取其事者，则曰：‘节某月日某报’。参各报者，曰：‘参某报’。约其文者，曰：‘约某报’。以示有据！”第一册至第七册中，“报录”下每一则新闻后都附有细致的出处说明，如第六册“时事鉴要”栏下的新闻《矿务设局》旁边注明“节二月十四日新闻报”，《西学开课》旁注明“录三月初二日官话七日报”。

后从“本馆告白”中，又可看出该刊因情势演变做了一定调整：“本报汇取各报，本注明月日，现因报馆林立，彼此抄录，因于第八期起径列原报之名，俾阅报诸君知有各报名目，亦益闻之一助也。”第八册后，一些新闻后附有节、录、参、约原报刊的月日，但更多地只标明报刊月份或只是报刊名称。

初萌时期的很多报刊力量弱小，生存尚有困难，何以坚持诚信原则呢？陈虬“弱冠以前，治词章训诂”，尽管后来抛弃了汉学这一体系，但早年一些真知灼见的浸润还是获益终身的。汉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如此诠释“诚信”两字：“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

¹ Wenner,L, The Nature of News Gratification., In K.E.Rosengren, 1985, p173.

²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53页。

大体可见，诚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包含言论负责和自身践行两端。该刊在陈虬主导下，确实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持论中正和自尊自律，洵属可敬。

信诚原则还体现在它有意追求的新闻独立意识上，尽管尚未有五四报刊明确提出的独立办报理念，但也明显透露出其欲取的客观、公正、独立向度。如谨慎刊载对地方官员的溢美之词，不愿给人带来依傍官府的感觉。《报例》中规定：“凡地方兴革利弊以及官绅创办之事，毫不雌黄，惟从善从长。间加擢扬者，亦须在事成之后，或地方官已离任，方免标榜、黄缘之习。”

特别撇清刊物与地方官员的关系，而非像彼时另外一些创办资源有限的报刊极力攀附官宦、谋取政治资本，这种做法体现了该刊的可贵操守，而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维新浪潮能够在温州蔚成气候，新任温处道宗源瀚也是居功厥伟的。南京人宗源瀚于 1895 年 1 月调任来温执事，上任伊始就在温州窠开言路，广纳诤言。郡城风气为之焕然一新，议政言政一时风行，如陈虬就在此时上书建议加强江防，获得宗源瀚赞许。宗源瀚本人倾向维新，曾赞扬强学会“造端宏大，意在开通智慧，荟萃群才”。对《时务报》“所定程则及纂述大旨”也很欣赏并给予捐助。¹《利济学堂报》的顺利发行面世，离不开宗源瀚的支持助力。为了促成陈虬在府城设立利济医院分院和分院学堂，他特捐廉俸 200 银元，“乙未秋季今观察江左宗公邀办郡城分院，捐助二百圆”（《报例》），并以此举带动地方上贤达名流纷纷为利济解囊斥资，他还率先赞助《利济学堂报》向全国发行，努力扩大影响面。包括利济系统在内的整个温州维新进步思潮的发展，都离不开他一力打造的开明氛围和强劲助推。在个人私交层面上，宗源瀚也与陈虬甚为投契，那时陈虬与地方大儒孙诒让之间因为一些陈年龃龉而关系紧张，两人剑拔弩张，且多有互相指摘攻击之语。宗源瀚见之不忍，积极从中斡旋解劝，试图化解他们之间的远年怨怼。对于这样一个在事业上、友谊上都极为关照爱护自己的睿明地方官，陈虬在自己的报刊中却严明规定不能颂扬其兴革利弊，不能为其政事造势宣扬，即使要擢扬，也必须等事成后盖棺定论时或地方官离任无甚权力揽手之时。在实际操作中，他也确

¹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札，第 4 册，宗源瀚与汪康年的函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65 页。

实谨严践行了这一办刊诉求，在 16 册刊文中，对地方官无所溢美之词。但陈虬内心是深切感铭于宗源瀚的识才惜才的，1898 年春，宗源瀚抱恙离世，陈虬悲恸不已，写成《挽联》来倾吐心怀，悼怀挚友：“遗爱遍瓯括一十五县，公原不死，究竟莽莽，感恩如我更无门。”从这些史料搜集中，足可见出陈虬追求的独立办刊品格和赤诚感念之心。¹也可以从侧面反映该刊设定的编辑方针：以学堂教育传播为依托，新闻传播、政治传播、科技传播并行不悖，注重诚信独立品质。

八 经营开发

该刊“报录”后常设“告白”栏，主要刊登一些启事告示：利济系统新动向报告（如在杭州设分馆、在郡城设分学堂医院等）、助资姓氏、医院学堂办事姓氏、售报处所、各地代售本报处所、本报刊误、本馆出售书目、本馆寄售报刊等。其中“本馆出售书目”处罗列了不少利济医学著作（如《利济丁酉医历史表》一角四分、《利济教经》一角四分）、陈虬阐扬一家之言的政论著作（如《报国录》三角六分、《治平通议》六角四分）、陈虬推广教育的著作（如《陈氏四书音义》六角）等。“本馆寄售书目”处则赫然质列有：《知新报》全年四元五角，《时务报》四元，《农学报》三元，《集成报》四元，《湘学报》（全年定价未明）、《西书书目表》（梁启超编撰）三角、《代数通艺录》一元等。

简剖之。（一）该刊已具备一定的拓开利源的经营意识。这主要与主编的个人体认有关。陈虬在经济方面有诸多崇论闳议的阐发，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景仰永嘉事功学派的功利论说，主张学以致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贵义贱利”观念的藩篱。1884 年，他在《善举尽可计利以图扩充说》中提出了自己的“义利之说”：“不知心乎利则无义非利，心乎义则无利非义。”²“重利”观显然也一以贯之地影响到了他对报刊的操作，这也是民间自办报刊能够持续下去的经济命脉所在。

（二）该刊的运营，已隐隐透出资源优化组合的二次传播意识。将学堂教育资源付梓成书，利用利济报章传播系统进行社会售卖，一方面推进

¹胡珠生，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388 页。

²胡珠生，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77 页。

了科技传播，另一方面也为报馆开辟利源。二次传播特征更为彰明较著的是，该刊主创人员有意识地对报刊内容进行了整合汇编，各期专栏的稿件，按分折线可以再次装订汇编为不同范畴的专集专论，对资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二度开发，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可资追索原刊风貌的钤印（如温州图书馆保存的16册《汇编》）。

（三）资本来源反映出该刊受众经营上的一些错位、脱节。《报例》中说到：“本医院向不募捐。十余年来广开学堂，整治药房，所费不貲，悉由院友自行筹办。除乙未秋季今观察江左宗公邀办郡城分院，捐助二百圆外，计瑞院积年捐润约四百余金，姓氏另列。此次创办院报，本郡报资照售码永减二成，以答诸公襄助盛惠。”可见出，报馆开办的资本主要来自于“瑞院积年捐润”（瑞安医院的治疾医润、学堂的生徒学费）以及社会名流捐款。那么，社会捐款又主要从哪些人那里挹注而得呢？《报例》接下来说：“本医院向遵院章，从无妄取捐润，以医为市，致妨利济本旨。本年开办报务，幸蒙同志踊跃输捐。院中亦未便矜守成规，自狭善门。其有大力官绅共开风气、鼎力扶助者，除将姓氏爵里随时登报外，院中重行勒石，续出各书另议酌谢。”可见得，“大力官绅”群体是其主要捐资渠道。

而“告白”栏的一些钱目明细登载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瑞安创建利济甲申乙酉丙戌助资姓氏”中统计出：共受捐146银圆，主要斥资者为国学、大令、司马、太史、孝廉、附贡、岁贡、上舍、茂才、贡士、乡宝等地方士绅显达，鲜有黔黎兆庶、民间工商业主的捐助。“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助资姓氏”中统计出：共聚资374银圆，主要为大令、守戎、茂才、国学、孝廉、岁贡、附贡、吏员、上舍、箱包、廩贡、学博等捐助。

“乙未郡城创设分院学堂助资姓氏”中见出：受捐200银圆，即为《报例》中提及的观察江左宗公。“丙申郡院分设学堂报馆助资姓氏”中见：共受捐230银圆，为茂才、上舍等捐助。总结之，该刊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权官员、实力派绅士、传统士大夫等群落，初创资本主要为士绅资本。

由此可揭橥出维新报刊自身难以避免的一大尴尬悖论：它的主要扶持者是传统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在其融资挹注的行列中是缺失散逸的，它与其所为之鼓噪、为之代表的阶级主体是游移、不熨帖的。进一步思索，当

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难以拒斥对旧有政治体系的依赖性，具有避乱趋安、谨小慎微的政治素性。在与狂肆叫嚣“冲决网罗主义”的激进维新派报刊之间的接榫上，这一阶级显然是并不积极主动，甚至是规避求保的。而传统士绅阶层的认知转捩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却迥然有别。“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¹甲午的惨烈挫败，使得传统士绅在精神认知上经历痛苦蜕变，不仅摧毁了对于洋务自强运动所萦系的缕缕希冀，而且更加深切地体认到了外祸肆虐、民族濒危的紧迫忧思感，主张补上洋务运动只“厚”器物层面的西化而“薄”制度层面西化的陈年积帐。一些开明之士旧梦惊顿，开始与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背离，求新求变，并借助维新报刊舒缓其焦虑悲怆、忧心如醒的危机情绪，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对此类报刊的毫不吝啬的解囊翊助。

从这一层面来看，历史确实也很值得玩味。传统士绅扶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新诉求的舆论造势运动，最后摧毁了本阶级，从而为马克思的那句颇费思量的名言作了极佳的注脚：“刽子手从来就是遗嘱的执行人。”

早期维新报刊大多具有此特点：激进的新言论与旧有政治体系、社会力量的杂糅共栖。正如有学者澄清的新闻史研究的一大迷思所言：“我们在理解政论报刊与其经济基础的关系时，应当破除阶级代表与阶级主体的简单和机械的对应关系。这一关系在传统根基濒于动摇、新事物呼之欲出的过渡时代往往难以确切获寻。”²

九 关于停刊

《利济学堂报》出版 16 册后，依然难逃戊戌报刊昙花一现的厄运。当年农历九月（1897 年 10 月），它在艰难存活 9 个多月后，即归于陨灭，最后一期出于白露日。具体停刊原因不详，据笔者翻阅相关史料，认为至少应有经济、政治、内容三大端绪的原因使然。

在经济方面，该刊后期利不抵亏，盈支相绌，“利源有限，挹注太多”。办刊后期，陈虬曾致书汪康年，告知：“敝《学堂报》分售有两千份之多，实销仅减半，而收数竟不及四成，并寄售各报亦在内。利源有限，挹注太

¹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8 页。

²唐海江，政治心态与清末政论报刊的资本募集，国际新闻界，2006，9。

多，敝院去岁亏折竟至数千金。”在婉转陈述办刊拮据窘况后，才言及“入都便沪时”即缴还所代销《时务报》存报及报资。笔者揣测，停刊的主要原因应是经济上的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这也是当时诸多地方报纸短命的硬伤所在，生存极尽艰难，正如陈虬信中喟叹的那样“想贵报外无一报不折本也”。毕竟那时蹒跚学步的报刊还大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媒介经营体系来，尤其是致力于政治诉求的维新报刊和有志于学术宣介的学堂报纸，而《利济学堂报》恰恰是这两种难以广开利源的报刊的集成体，其发展走势也就可想而知。1901年2月印发的《瑞安利济医院股份票》上载有：“丁酉（1897）另招新股，由院拓办《利济学堂报》，缘事停止。……即报馆各股除已付外尚二千余元，郡院亦无款可抵。”可见亏损之惨烈。陈虬也因报馆停刊、学堂停办、医院亏损，再加上变法失败后被通缉，致使人生陷入低谷，亲友邻里“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恶我、骗我”，以致“闷极愤极”¹，至此完全失望：“病变亟亟矣！势及迫矣！天荆地棘，谁遣我耶？”“天何不祚？命也如斯！谁或知之？！”终于贫病交迫，于1904年元旦撒手人寰，享年五十三岁。

在政治方面，该刊第四册后招致了谭嗣同等维新斗士的退订和诟病，销路迅即萎缩，亏空也就随之甚巨。农历四月十四日（5月15日），陈虬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还难掩欣喜之情：“《学堂报》已出四册，近郡都甚风行。”不料其后形势直下，陡然逆转。因很多维新人士认为陈虬自称“教主”，医院学堂并举，等级分明，制度森严，倡导五行、风水、壬遁、星命等旧说，古代方术包袱沉重，维新的激进姿态沾染上了腐朽色调，而对其苛评不断。其中，谭嗣同对其攻击最为酷烈。丁酉六月廿四日（8月11日），谭在给汪康年的信流露出对该刊的强烈不满：“《利济学堂报》乃缘《时务报》已登告白，故买阅之。今寄到，不意中多迂陋荒谬之谈，直欲自创教，不关于学术。彼既刊本，自可拆购，现寄到四本，即请自此截然而止。……非嗣同敢为反复，致劳清神，实虑此报为害不浅。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彼欲为教主之

¹陈虬《致杨逢春书》手迹，温州市博物馆藏。

²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506页。

私意尤其小意者也！”¹陈虬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在学术传播和教育传播方面的，惹起了后期不少维新人士的猜忌和不屑，也使得其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维新报刊销量暴跌，遭遇了不少的退订情况。而此时各地报刊又接踵创办，竞争日烈，顽固派对陈虬又是“风潮撼山岳而来”，重重事由最终压垮了该刊，导致了不久后积重难返的报刊的覆灭。

在内容方面，该刊的主导思想和一些报文内容与当时的维新思潮有所出入，存在问题。如《报例》中赫然将“堪舆、壬遁、星平、风鉴”这些封建糟粕列入提倡主旨之一，在变法的理论出发点上仍然逡巡在“名教纲常之大本”，浮于表面地认为“泰西富强之本”只是算学和化学两端等。再加上部分文字隐晦古奥，诘屈聱牙，带来阅读上的门槛，不易遍及普罗大众；部分医论专门性过强，只能流于同人自赏的囿囿，难以推广；由于采编力量、地域限制等现实壁垒，其新闻报道都转录自他报，缺乏本报采访稿和译稿，成为了类似于文摘的报纸。而这些都是该刊在运行中始终相携而行的弊端和软肋所在。

第三章 社会视野下的《利济学堂报》及其外部影响

本章将从社会的视野来全面透析这份刊物的传播价值、外在影响。主要从政治传播、科技传播、教育传播三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节 作为浙南最早的维新变法报刊及其政治传播

作为浙南最早的维新变法报刊，不妨通过文录大栏下的 25 篇政论立言来解析其政治传播的意义、价值、动员手段、动员机制、与科技传播的关系等。

历期重要政论有陈虬《心战》（上中下）、《箴时》、叶麟凤《国耻足以兴论》、陈明《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论自强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黄人不宜视变法为无裨，因循自误》、《灭儒》、《论变法须首自易西服始》、陈钟琦《论强国必先强民》、金铭《原才说》、陈兆麟《求才急于育

才论》、程云《论今日中国首以简使才为急》、周焕枢《大建素王教会议》、池志澄《书治平通议弛女足章后》、蒋瑞骐《上医医国论》、高炳麟《论学会宜普尊教宗首举农务》、周鸿年《论中国议院既不可行，宜直省府州厅县遍设报馆，有裨吏治官方匪细》等。主要从以下诸方面来分析这些政论，借此勾画出该刊的政治诉求。

一 政治传播的意义：实践言权

该刊在当时闭塞冥顽的社会风气下，于浙南小城勇开先声，牖导新潮，无异于警钟木铎，震醒了不少沉睡者的迷梦。这是对陈虬个人奉若皋陶的“言权思想”的积极实践，并严丝密缝地架构起了其落实言权的缜密路径。尽管他在自己一手创办的《利济学堂报》上对此没有专列文章阐述，但1897年11月，他在其主持笔政的《经世报》第12册上的一篇政论《言权》中，就极好地总结了这一做法，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思想。在《言权》中，他写道：“夫物莫平于权，我从为之说，曰：在上有政权、教权，在下有言权。”嗟叹之：“然则言终不得平矣，而宁有权焉！”，认为言者无罪，不应因言获罪，中国无言权“是我徒之耻”，并袒露立言报国、力挽狂澜的心怀：“我儒不事事，犹当以言救天下。”陈虬积极要求“广言路”。“何谓广言路？……宜令内官自司员、编检，外官自各道以上，各许直陈时事，不由本官，直达通政司。若遇大事变，则下诏求言，无论军民，概许上书。”这是陈虬在君主体制内冀望达成的下情上传、政通人和的理想境界，尽管囿于传统士大夫思想的浸淫，而未能跳出君主专政的窠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其民权诉求和民主思想，代表了维新派力求言论自由并参与国是的时代要求。

顺延承袭这种个人诉求，陈虬进而将言论自由思想导入到报刊操作中去，尽管这种自由远非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但粗砺的自由萌芽在当时也是可敬可佩的。他在1897年8月《经世报》第1册上撰文《论报馆足翊政教》一文，深入演绎了其力主言权的报刊观。他认为报馆的设立为各种思想观点的博弈胶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思想的交锋易促成社会进步昌明。“若以施报馆，则先民刍蕘，愚虑一得，涓助埃补，旁观静深，

反覆舆论，靡休弗扬，靡过弗匡。《诗》不云乎：‘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语故有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由是观之，陈虬是站在有益政教兴盛的角度去弘扬报馆言权谏诤的重要性的。为了实践这种言权，他主张大兴报馆，广兴政论，进而采撷民智，开发民智，改良国家，以臻进步。这种思想在他苦心经营的政论栏目里就有极生动的反映。

二 政治传播的价值：提供社会改革方案

受瓯越务实遗风的影响，该刊的政论相当务实奋发，有破有立，注重建设性，积极致力于提供国家和地方的切实改革方案。这与主办者陈虬的个人体认极有关系。《心战》一文中，他显不认同那些坐而论道、空谈误国、因循自固、醉心书斋不闻世事的读书人，认为他们“溺心于章句，研心于帖括，桎心于文法，淫心于干戈，役心于妻孥，游心于利禄！心之不竞，而遑言战为！”。显然地，他更倾向于务实贤达人士能够在国家风雨如磐时挺身而出，贡献智识，图谋改变痼疾，寻求新途。他在改革方案上，突破了早期洋务派固守的器物框架，认为变法的命脉应在政学制度，而非停滞在商兵器物层面。他一针见血地在《心战》中指出了洋务派三十年新政心血付于一炬的根源在于只问器物、不问制度的中体西用观：“中兴以后，二三巨公，辄知中法之无用，而兢兢于效彼之长者，不可谓不至矣！顾以三十年揣摩简练之兵，韩京一役，卒尽师灭，海军之设几同赘疣，岂诚立法之不善哉！”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维新运动何以命运悬殊？在《箴时》一文中，他指出中败日胜的原因在于“日先考求西之政学而后其商与兵，中则汲汲于枪炮战舰”，应该记取教训，重新审视并修改强国途径：“甲午一蹶，乃驰骛于各学，力不能奋，势不能专，复不能不兼顾水陆之军，而政治大纲顾未逮焉。”强国途径应予以纠偏，回归政学。陈虬主张“全球方輿之形，大地兵战之学，五种消长之机，万国政教之纪，六洲农商之务，修我中百子之高谊，参彼西诸家之新法，逸者还之，遗者补之，缺者增之，讹者正之，分者存之，合而诣之，融而洽之，贯而穿之”。可看出，陈虬认识到了中西互补的重要性，主张融贯中西，两者不可偏废其一：“愚中而智西，于古必疏；轻西而轩中，于今曷济？”陈虬的政治思想随着时

局的更迭而不断深化，逐步突破早年的洋务思想而转向维新思想。在这种维新思想的框架里，该刊的政论中刊载了不少极有见地的改革方案。

陈钟琦在《论强国必先强民》中痛斥商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愚民专制制度，认为“中国之弱以弱民始，以中国之弱而务强则亦自强其民始”，而强民之道在于“编户为兵，给以军械，宽以岁月，联以保甲，资以简练，予以权利，假以仕途”，并“牖其智慧，广其学术，恣其制造，通其情愫，纵其游历，拓其闻见；胥吏不复掣其肘，有司不文致以法”，使得“士强于学，农强于耕，工强于艺，商强于财”。这种欲改变强政府、弱社会困局的诉求，与陈虬伸张民权的主张如出一辙。1898年6月9日澳门《知新报》上刊载了《浙江孝廉陈虬等呈请总署代奏折稿》，陈虬在其间提出“国之强弱系于民心”，为了达到强民心的目的，必须给人民以利权，不能封杀人民的权利之途，国事垂危，民权尤重，“为今大计，宜大假民权”，将社会力量从专制政体的打压下逐渐释放出来，用逐渐丰满的民权来削弱大一统的君权，对君权形成牵制掣肘之势，以重新构建中国的权力布局，达成社会从积弱积贫走向强健有为。

力倡民权就应启迪民智，培育人才，壮实民间智库。变法图强的关键在于人才。叶麟凤在《国耻足以兴论》中言：“中国之耻非徒兵之不强、器之不备、利之不兴而新学之不昌也，其患首在无人才！”金铭在《原才说》中言：“今中国亦亟需才矣，奈有才而无才何！曰：是非才之罪也！”鞭辟入里地指出了体制扼杀人才的沉疴之累，社会制度“困之辱之，杀之戮之，束缚之驰骤之，万端以挫折之”。陈兆麟在《求才急于育才论》中要求政府“加意于求之”。程云在《论今日中国首以简使才为急》中举陈外交人才的卓荦不凡：“曾惠敏与俄争伊犁一案，崇约以改；薛叔芸争立新加坡、香港领事，竟转能囿于约章之外，使之效也。”这些对人才的极力宣传，桴鼓相应，一环紧扣一环，已形成辐射力极强的磁场和同志社区，陈虬在编辑稿件时显然就有意追求这种层层递进式的传播效应。

改革方案还有更为细化、更为切实、更易操作的。陈明在《论变法须首自易西服始》提出了一个微观的日常生活的改革方案：“近日中国不更张则已，若近日中国而犹欲更张也，则必以易西服为首策。”在陈虬、宋

怨“易服改制”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易西服的三善：轻温利便、绌束完固、振人神智，“若朝廷一旦赫然下明诏，令中夏生民尽易西服，则亚洲华域大改其观，而精神不患其不振矣，一切西政遂渐仿行亦不患无其效矣”。尽管他夸大了易服的作用，但其心可恤。维新志士们希望通过一场“身体的政治”来配合维新运动的推进，通过服饰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革新来立新求变，突破传统思想的桎梏。

三 动员手段：危机意识

该刊政论的一大鼓动手段就是深刻描述艰危时局，以求唤起兴革利弊的有效共识。陈虬在《心战》中哀痛直陈阽危国难：“彼族之侮我甚矣！侵我口岸，削我壤地，虐我羈民，拒我使臣，外我公法，预我政治。……吁！可慨已！”他提醒读者，个人的前途命运悬系于国家的积弱或富强：“生是时者，将忍而视其为奴为囚、为牧圉为犬马而不知所救耶？抑或起而思有所争也！”叶麟凤在《国耻足以兴论》中更是极力阐述国难浇漓，认为甲午战败是国人大耻，但要善用国耻，使之转化为整合人心、图谋振兴的契机：“耻之为用大矣！彼泰西、日本之强与中国之弱，在能耻不能耻之间耳！”陈明则在《论黄人不宜视变法为无裨，因循自误》一文中强调要与志士仁人们胶柱鼓瑟于变法之途：“夫天下之病不患强邻之交迫而患国气之不扬，不患四民之俱困而患众志之不壮。中国苟及今发其热力，联其爱忧，奚患不能转危而为安，因祸而为福！”可见出，该刊的政论也是利用亡国灭种的危机宣传，来凝聚人心、浇铸共识的，这与那时众多维新报刊的操作手法何其相似，这种先切时弊惨重再谈变法日亟的做法对当时社会还是极具传播穿透力的。

四 动员机制的特点

该刊政论一个颇具玩味的现象是其动员号召机制的建构特点。其中多篇政论的立论，开篇总是先援引神农、黄帝来论证我们这个积弱民族的伟大起源。这种做法在陈虬个人的政论里尤其明显，他极其善于在列强环伺的语境下，附会祖宗的鸿猷伟业，酷评当下的沉疴痼疾，言必称神农轩辕，

来极力打造一个渊藪深厚、不屈人后的中国的形象。

这种操作路径是在特殊年代获取社会动员感召力的很好手段。当时尊古而薄今，竭力攀附伟大先祖，其实就是在重新发现中国的过程中，用始祖来作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象征，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继而获得证明自身言论的资本。正如葛兆光所论述的这一现象：“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¹《利济学堂报》欲汲取社会热力，也采取了相同的借古而论今的手段。它甚至用西学来缘附中学，以求论证西方文物制度的渊源仍在轴心时代的中国远古。

为了增强西方政学在中国的认知度，陈虬在政论中提倡“西学中源”论，以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兼容并蓄、并不相悖。这在政治传播上已经走入了另一个欲求效果而歪曲手段的极端了。尽管他为维新派立言，但在引进西学时，却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被他自己所诟病的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论来获取立言依据。比如，他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来自中国，“今者，耶稣、天主之教闯然而来吾国，其实彼教之所以来，正吾教之所以往，如周、孔之教遍天下，则人各明其五常之性，如昏而得旦，群星掩光而日乃出而经天矣，吾子悬盼以望河清可也。”甚至他在政论中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皆发端于中国古代，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但其实早已大行其法：“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子产不毁乡校，其知此义矣。盖古圣铎之设，犹轩之使，皆诱之使言，凡以求通下情而矣。”这一方面可看出陈虬政治思想尚停留在早期维新派的认知水平上，不可能真正洞悉西方政治的民主实质，抹煞了西学西政与近代工业文明休戚相关的联系，另一方面也看出他这种将一切先进事物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古已有之的谬托影附的传播手段的极端化使用。

另外，如上章“经营开发”一段中的阐述，《利济学堂报》所倚赖经营的受众是存在一定错位的，它偏移了新兴资产阶级而过度倚重传统士绅，这一点在该刊政论的动员机制上也是有所体现的。陈虬在政论中主张

¹葛兆光，祭罢炎黄祭女娲？，南方周末 2008，3，27。

变应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可又强调只是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其文章中鼓吹的变法宗旨乃为“慎其所变，求不悖圣人之法”，依然是在坚定维护圣人的道一统以及传统士绅已有的知识接受格局。他所主张学习的西方之“法”是潜隐于中国的恒久之“道”下的：“法虽国异而代不同，而道则终古不易。”他所引入借鉴的西学也是必须处处迎合中国圣学的：“考泰西各国，讲富强，工制造，虽形下而颇近乎道。”在西学的范畴里，他又将导致西方繁华富庶的因素作了本末划分，尤其突出政治制度：“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但将他极其看重的议院主张纳入同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比较，他还是认定医院是器、末、用，而没有转化为道、本、体。可见，陈虬在政论动员上做出了调整，期望能以更符合主要读者认知结构的传播策略，以更易被他们接受的传播方式，来追求“传而致通”的效果。

五 与中医传播的关系

具有维新政治刊物和最早医学期刊的双重身份，《利济学堂报》又是如何衔接强悍的政治传播与哲明的中医传播的呢？

因为运作在“人心莫不思变”的狂飙突进的特殊时空场域中，因为主办者陈虬的历史身份一直游弋在维新政治思想家和中医药大师之间，他的论医，籍医以论政，医医即医国，习医以保种。陈虬的政治内核更加张扬于其医者的外貌，“医医”与“医国”浇铸一体，“鼓吹手”和“实干家”并行不悖。所以，该刊在改变世人科学观的同时，也形塑了他们的世界观、政治观。中医科学的昌明开化，从本质处上引领的是关于世间生命一律平等的普遍性体认，“而悟大小齐同之理”，进而喧腾而出的是民权思想的萌发、政治信仰的改观。这一作用路径，颇类似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这本地理普及著作实际上对近代国人所产生的平地惊雷般的政治教科书的强效应。该刊上登载的重要政论《上医医国论》就很好地揭示了政治传播与中医传播间的关系。

第二节 作为第一份新式学府期刊及其科技传播

《利济学堂报》作为最早绘世的中医科技期刊，有必要对其中医科技传播进行厘清，以认识其在中医科技传播演进史上的占位和作用。

陈虬作为浙南医药界的黄钟大吕，熟谙经典，慎求古训，发皇古义，又能别出心裁，撷拾西学。他的医疗知行活动很好地诠释了“心系岐黄，利济苍生”的利济诉求：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六年（1880），从因病习医，到临证议方，再到30岁时著《蜚庐诊录》；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1895-1902），从撰写《霍乱病源方法论》，到瓯郡霍乱盛行，出为治疾，再到总结为《瘟疫霍乱答问》。在长期的悬壶实践中，他对证用药，阐理精微，每起沉痾，善用经方加减治奇病，并逐渐体悟到：“认症之诀，当于反正疑似处辨别明白，自解自难。久之，自有一种真正道理，横飞跃出，焕然于心目之间。特非多读书、多临症者，亦断不能有此境。”¹

他早年仿清初名医喻嘉言的医案集《寓意草》，著《蜚庐诊录》二卷，载疑难病案二十则，详述诊疗过程与用药效果，提供了辩证施治、解决疑难疫病的卓越范本。该书成于1880年（光绪六年），也是利济医学堂的教材，初载于《利济学堂报》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册。从报端文章可看出，陈虬认病识症，以《内经》、张仲景之说为本，对运气学说的阐发，对经方方义的认识，都能做到辨清本源，直叩积弊。比如他论说膨胀、关格，辨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阐述温州当地妇女产后饮服姜糖滋养的乡俗的弊端，都不拘陈言，倡扬新论，俱中肯綮，并为当时的同侪探讨、师生磨技提供了鲜活素材。借助办报，他将科技文化从学校教育传播的狭仄天地导向了社会普及传播的广阔畛域中来，实现了科技传播覆盖面的延伸扩展和效果的放大辐射。

陈虬撰写的《瘟疫霍乱答问》也通过该刊的“利济文课”一栏起到了破除蒙昧、倡导新知的积极社会效应。此书以问答形式讨论霍乱病源、证治、方药，闪耀着辩证诊治、区别对待的睿明光辉。该刊第七册的“文录”首篇还刊载了他的《霍乱病源方法论》一文。针对当时医者用药“一刀切”

¹刘时觉，陈克正，杨力人等，近代温州医学代表人物和维新思潮，中华医史杂志，2006，4，第36卷，第2期。

的惯习，他认为：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霍乱则属于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耳。并研制出了九服利济专治霍乱方剂，八服利济天行应验方，一服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补全了王孟英《随息居霍乱论》的有论无药的缺憾，这在当时医药卫生因循凋敝的情况下无疑是一道纶音新语的注入，并有效付诸了实践。1902年夏，东瓯霍乱大行，民瘼深重。陈虬痼疾在抱，秉持此种医学认知，在构建地方医疗体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厥功至伟。他的《瘟疫霍乱答问》一书后被辑入《中国医学大成》，成为中华医药绵泽世代的瑰宝。主编曹炳章赞誉其“试之多验，远近传抄，时医奉为圭臬。先生昕夕出诊，不以为苦，活人无算”¹。

该刊还载有陈虬的《利济医药讲义》八册、《元经宝要》二卷、《利济本草》六卷、《利济医统》六卷、《医雅》四卷、《医绎》四卷等，重要医论有陈虬的《祷医圣文》、胡鑫的《论医家古三学之源》、《论小儿中暑痉挛不宜骤开心窍》、陈葆善的《白喉条辨》等，真正实现了医者心得研习、学堂授课材料与报章普及知识的绾接交汇。

在中医传播内容方面，该刊毁誉参半，也有不少遭人诟病之处。批评者认为它残存着不少封建、保守、陈旧、甚至是落后的因素。《报例》赫然将“堪舆、壬遁、星平、风鉴”列入提倡内容。这在陈虬的论著中最为典型，《箴时》、《保种首当习医论》、《霍乱病源方法论》等中都有所发挥阐扬。《报国录》按照“奇（门）遁（甲）”、“九宫紫白法”列阵图，甚至依据五运来认识过去，预测未来。《心战下》说“金行应运，得时者胜”。该刊“书录”中的《中星图略》是利济医学堂测候学的教材（以45大星划分法），《医历表》、《医历答问》为把测候学结合古代天文学中的“中星图”，从而创制的一种医学专业的历本——医历，“推其将然，策其未然”来推算预测疾病，具有凌空蹈虚、神秘莫测的气息。这些古代方术包袱，激起了谭嗣同等进步学者的不满，以为“中多迂陋荒谬之谈”，并严正指陈：“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貽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另外，陈虬在医学上虽不乏创见，但其医学主导思想却相

¹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瘟疫霍乱答问提要》，第4册，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703页。

当滞后保守、不切时潮。他在医论上过分强调五运六气学说，将运气视为医学之本，主张将运气与藏象、经脉相提并论。自从医学分门户于金元之后，运气学说日益式微，到清代医界动辄就言运气者已寥寥无几，而一代医学巨擘却将这一见地当成论学之本，这说明他的专业思维深受其方术迷信包袱的掣肘，自然整张报纸的运作也时不时散发出一种陈腐的气息，为当时直欲冲决网罗、汰弃旧学、破坏主义盛行的激进人士所指摘。

关于该刊强调阴阳五行、运气学说这一点，我们不妨辩证看待之。从知识身份体系的架构来说，政治理念上的激进并不意味着学术思想上的革命性，破旧立新的思想家也沾染着旧的痕迹和底色。这主要由于，他是从士大夫等旧知识分子的阵营中濡染新学后分化出来的，双重身份的杂糅交织间，强势诉求的簇新面貌下也难以褪去潜隐运行的旧底色。

从中医学的传承来说，这种陈旧的立学之本也并非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价值性。萦绕中国现代科学界并引起深切反思和谔谔众语的一大问题是“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烜赫辉煌，但行至近代大部分领域却殒落失语了。惟独中医学、农学还保留着一些特质，继续前行。缘其由，很大原因在于：中医建立了学科主体性和独立性，具备了较为严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界限。中医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从阴阳、运气之说中汲取了独特的符号体系和哲学根基，才能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气息的氤氲笼罩下一路踽踽行至近现代。

该刊很好地体现了学报科技传播的价值。梁启超在考察清代自然科学缘何滞步不前时，提出：“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其大业也。”他的体认“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对于我们今天在学术制度的框架下来正视学报科技传播的重要性，颇有启悟。

第三节 作为第一份新式学府期刊及其教育传播

该刊作为最早的新式学府期刊，又有必要廓清其在教育传播方面的卓萃贡献。

《报例》言：“本报所列医籍、算术、数学、音韵、体操各书以及一

切文课均出在院诸生商订分撰，意在开示后学。”提携后进，鼓励学生探索、实践，养殖民主理性的学习氛围，培育桴鼓相应、辩驳交锋的学术社区，可从中窥见一斑。尤其是在“书录”中《利济卫生经》和《算纬前编》的设计上。

第三册刊登了一篇学生何炯撰写的论述体操拳勇源流的文章。“近曰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拳勇字诗巧言外，能旁征其说欤？言拳法者，不一以何书为详，又有所谓内家外家，其别安在世传易筋经。幼学操身，互有得失，试言其故。院定卫生经，虽意主导引，而一切拳勇之法、操身之术皆寓其中，能历述其源流，明其宗旨欤。”何炯，字雨农，习成后担任利济医院的协理兼撰述，院次济三。他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录进《利济卫生经天函》中去，该书由陈虬订正，院内学生张烈绘谱，同院诸生参定。张烈，字煜卿，陈虬的初传弟子，院次道四。张烈自小体质羸弱，以操演长拳来强健身体，经常与人探究人身经脉起止、针穴流注及体操拳法解数，并在陈虬的指导下制成《卫生经》（陈虬本人从小也喜拳勇），搜集五禽戏、各家气功导引及易筋经之长，作为医学堂体育课之用，指导学生锻炼心身、体育疗病，并通过报章传播，普及这种保健之术。《利济卫生经》原题有 28 图，36 范式，每势下有练功方法及治病保健的适用性范围，今存《利济丛书》中仅 25 图、势，且大多为末句，语意裂断，已经撼然成为残卷，不可窥全貌。

陈虬善于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入院学生的特长兴趣，加以适当引导，



遂成新颖、有见地的一家之言。该刊第三册“文录”中，何炯就在文前的编者注中感喟：“诸生入院有年，师友之间习闻已熟，其各抒所学以对。”“书录”中刊载的《算纬前编》也是由学生陈侠编次，再经陈虬鉴定成书的。

《利济学堂报》作为学报，一直践履着配合学堂建设的自天职命。胡滨认为，1885 年创办的利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校，比上海名医丁甘仁、谢利恒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

校还早了 30 多年。¹林乾良也考证，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²1885 年，利济医学堂在瑞安县城创办，后又在温州、永嘉、平阳等地接踵设立分校，足见当时庠序规模的盛大。19 年间共培养学生 300 多人，许多学员成为彪炳中医史的魁儒大师，其中陈葆善、林獬、池志澄、郑叔伦、金慎之等不仅医术精妙，而且著述丰赡，名重一时，泽披身后。2006 年 5 月 25 日，利济医学堂博物馆正式被国务院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瑞安一座别具风貌的历史文化丰碑。

该刊第 2 册“院录”中载有陈虬亲自制订的《利济医院习医章程》，规定学徒入学年龄为 14 岁，学习年限 6 年，学成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批准试医，并给试医图章，学徒膳宿皆在院内，第 1 年至第 3 年学徒伙食费由院垫借（针对衣食无着、蓬门荜户出身的穷苦学生），将来毕业行医后由所得诊金中提成归还，第 4 年院中津贴半数，第 5 年全部，毕业后即给俸金，优秀者留医院服务行医教学。³学堂教材分普通课和专业课，设置丰赡，知行结合，择取各学所长。普通课有国文、历史、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体操、词章著作、时务游历等。专业课分医学经典和各家医籍，自编教材有《利济教义》8 种，包括《利济教经》、《中星图略》、《医历表》、《医历答问》、《卫生经》等，其它重点教材还有《新字瓯文七音铎》、《利济文课》、《蜃庐诊录》，全部以讲义体、问答体的形式刊于各期“书录”中，兼作社会教育之用。此外，《章程》中还规定了严密的考试稽查制度、学生等级制度、作息制度等。学堂按照“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杖”16 字区分世次，“道”字辈是他的初传弟子，如陈葆善为“道一”，依次为再传“济”字辈、三传“群”字辈。

在学习方法上，陈虬亲为垂范，平日主持教席，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能力。他为学生指明治学方略中的源流互证之道：“读书之道当由源及流，流别一清，须再治流溯源，回环往复，左右逢源，将所得无一非书矣”⁴。并开列“医藏书表”，区分医书为必读、必阅、必备三类：必读书 21 种，如《王经内注》、景岳《类经》、陈修园《本草经读》、徐灵胎《本

¹胡滨，清末民国时期的浙江中医界，中华医史杂志，1997，10，第 27 卷，第 4 期。

²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医史杂志，1980，第 10 卷，第 2 期。

³刘时觉，朱国庆，杨力人等，晚清的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医古文知识，2003，3。

⁴金日红，利济医学堂始末及教学概况，中华医史杂志，1982，第 12 卷，第 2 期。

草》、《难经注释》、《伤寒贯珠集》、《金匱心典》等；必读书 50 种；必备书 32 种，皆很允当中的。学堂还分古今医籍为名家书 59 种，如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专家书 21 种，如吴又可《瘟疫论》等。面对卷帙浩繁的医籍，“必读之书当循序渐进，必阅之书当择善而从，名家则观其独到处，专家则求其独异处”。学堂专设近代最早的独立图书馆“心兰书社”以供学生借阅。同时针对学生知识群落的参差不齐、级差分化，他提倡简捷通俗的教学方式，专门为弟子们编撰近代最早的公共教科书——《利济教经》36 章，3 字为句，协韵好读易记，牯触广泛，内容翔实，为百科式的蒙学课本。

在教育视野上，利济医学堂主张中西结合，在承认中医价值的基础上摭拾西医，兼容并包，提倡学术宽容和自由。陈虬把刚刚传入中国的新医书分为“全体学（解剖）”、“心灵学”、“卫生学”三学七类介绍给诸生阅读，共列书目 48 种 174 卷。这在中医教育史上实开了中西医结合之先河，该种雍容大度的学术胸襟和气涵令人感怀。清末的不少热诚办报者都是眼界雄广、吐纳中西的黄钟大吕。同陈虬一起主持杭州《经世报》笔政的章太炎，也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力主中西医互补。从 1889 年到 1936 年，他撰写了 100 多篇具有鲜明革新思想的医论，被近代医界公认为“国医革新之导师”。¹

在知行取向上，利济医学堂知行贯通，重视真知灼见的融注医事实践，培养实际知识和技能。临床实习中，指导学生“每临一症皆要认病和辨证”；整饬有序地写好脉案，“医必有案，方能于脉因症治有所发明”；严格考核疗效，“立案以明治法”。陈虬吁求“读遍图经千部，不如栽药一区”，在学堂内设生药局和鲜药圃，要求学生身体力行。在药物制剂方面也有创举：教习们指导学生提高识别药物真伪的本领；创立宣白散、清肺散等名目，以避温州、瑞安畏石膏的医事风俗，苦心孤诣地推行保护性医疗方法，以减少实际推广中遭致的梗阻。

陈虬的教育思想在彼时较有见地。他认为官制改革是变法之纲，而科举改革是变法的“纲中之纲”，而变法最终要靠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来实

¹廖家兴，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见解，浙江中医杂志，1980，1。

现。这与当代转型期中国提倡的“科教兴国”战略有一定的精神契合处。甲午顿挫之后，他接受了西方的民权思想，“为今之计，宜大假民权”，主张冲破封建愚钝民众的樊篱，大力开通民智、强民心。他又指出开民智的两条途径：首先是开讲堂、兴学校，开讲堂属于开民智的应急之举，而广设学校才是长远之计。

其次，实行文字改革。他把文字改革的迫切性提升到国家昌盛的无上高度，认为：“现今吾们大清国的病呢，是坐在‘贫弱’两个字哪，只有富强是个对症的方儿，因此造出新字，当那富强药方的本草。”他朝乾夕惕三十余载，研习文字改革，于1903年春第一个创造出拼音文字，取名瓯文。他分瓯文为28部，据新创98字演为标音符号404个，清新洗练，易识易记易学，“真乃是文字场中的轮船、铁路”。他已经认识到了普及性强、穿透力大的传播技术、符号对社会系统的摧天坼地的强效应，“文字如衣冠、车船一般呢，原取便民适用，合时为主”¹。1903年秋，他刊行了《新字瓯文七音铎》和《瓯文音汇》，前者为新字初级教科书，后者为用新字注音的温州话同音字汇。他还主张多设瓯文学堂，并在利济医学堂开办了瓯文学堂。他开创瓯文识字，还与他的另一教育诉求有关：实施义务强制教育和平民教育，希望通过人人可学的瓯文，来破除拮据聱牙的复杂汉字自天携带的阶层区隔力，使得“不论妇女、农野，每日熟课一点钟，月余皆自能写信记账”，再稍使气力，“并能阅报读书”²。这种视教育为本的理念也有力促进了乡土中国的建设和近现代温州的民间启蒙发育。

^{1 2} 《陈虬集》，324-327页。

结语

1897年1月20日陈虬于温州主编的半月刊《利济学堂报》，共出版发行16期。该刊在编辑上，已具备初步现代新闻传播意识，版块、栏目理念突出。内容涉及到新闻、政治、中医、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多元性特色：著述和编译相结合，既有学术性、知识性，又有新闻性、信息性。新闻选录上注重全球眼光，编辑方针突出“信诚”。已建立起一支稳定的采编、经营、管理队伍，发行范围扩散到沪、杭、京、津、鄂、闽、粤、澳等地，偏重私人传播渠道和商业传播渠道，拥有一定的经营开发作为和资源优化组合意识。受众经营上有所偏颇，不重民族资产阶级，倾向于传统士绅，与其真正对应的受众群体有所游离，为日后期刊的陨灭埋下致命伏笔。

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传播视野来看，本论文对该刊的研究总结如下：

一、从新闻事业史的角度来看，《利济学堂报》成为衔接强悍政治诉求与哲明科技诉求的卓越样本。因为运作于“人心莫不思变”的狂飙突进的特殊时空场域中，因为主办者陈虬的历史身份一直游弋在维新政治思想家和中医药大师之间，他的论医，籍医以论政，医医即医国，习医以保种。陈虬的政治内核更加张扬于其医者的外貌，“医医”与“医国”浇铸一体，“鼓吹手”和“实干家”并行不悖。所以，该刊在改变世人科学观的同时，也形塑了他们的世界观、政治观。中医科学的昌明开化，从本质处上引领的是关于世间生命一律平等的普遍性体认，“而悟大小齐同之理”，进而喧腾而出的是民权思想的萌发、政治信仰的改观。

二、从科技传播学的角度看，《利济学堂报》这样的早期学报为现代学术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和供给。学报内蕴的学术发表、交流制度，预示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面貌。现代学术的蕴藉成熟，仰赖于两大端：新式教育传播与大众传播，有了这两个助力器，它才截然有别于以太学、书院为活动中心的传统学术。

三、从教育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利济医学堂作为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摸索出了一条崭新的教育传播路径：育人、科研、报章三位集于一体。蔡

元培在民国初年就已提出，欲将大学打造成“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充分发扬大学建设中教育、科研的两大端。而利济医学堂更是将报章的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借助办刊实现了由关门授徒、登门造访、口耳相传、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传统传播的载体，向锻造“公共教科书”的社会机构的转变，受教育者也由被动受业者转变为集办刊者、社会教育者、科研者于一体的公共角色。而这在整体信息资源并不充裕的传统社会体制下，有助于不多的公共传播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使用。

四、从传播结构系统性建设的角度来看，陈虬首创的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利济学堂报》、心兰书社构成四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传播组织结构和医疗传播、教育传播、期刊传播和图书馆传播相辅相成的特殊模式，构成了一个极具新闻学与科技传播学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并成为之后学府科技期刊的范本，也为今日大多数依靠单一财政拨款来运行的大学学报，提供了经营上的多元化启迪。

五、在戊戌温州场域形成的传播全景图下来透析《利济学堂报》传播子系统的建构意义。它成为戊戌时期温州社会孕育现代化因素进程中卓有成效的传播先声，既通过传播促进了社会变迁，带来了政治上的开明求变、经济上的务实有为、文化上的开通广采，其传播本身又成为了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成为了一道彼时温州社会的卓越标杆。

六、从戊戌温州特殊的地方社会特质、思潮来认识该刊。由于历史传统沿袭、生存条件作用等诸多地方因素的作用，晚清温州维新知识群体在维新的大气候下，坐言起行，既有进步激昂的变法维新思想，又有开拓务实的维新传播事业上的践履躬行。这除了时代救亡主题的推动外，也还要归因于温州地域整体上的注重“实事事功”、“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而热衷于物质利益追求”的思想文化底蕴。而这些特质都具体熔铸进了该刊的操作上，使得《利济学堂报》少了一些激烈决绝的浓烈政治意味，多了一些务实经营的平和色彩。

对于《利济学堂报》的研究，本文尚有以下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刊文的内容还需深入梳理，对陈虬的传播思想还应总结提炼，对该刊运行与当时社会背景、地方特质之间的联系还应继续寻找。

参考文献

- [1]姚远,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胡珠生, 温州近代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 [3]胡珠生, 宋恕集, 中华书局, 1993.
- [4]胡珠生, 陈虬集,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5]谭嗣同全集, 中华书局, 1981.
- [6]上海图书馆编,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 [7]曹炳章, 《中国医学大成·瘟疫霍乱问答提要》, 第4册,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 [8]王树增, 1901年: 一个帝国的背影, 海南出版社, 2004.
- [9]张宪文编, 孙诒让遗文辑存,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10]史和, 姚福申, 叶翠娣,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1]上海图书馆,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第一, 二, 三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1984.
- [12]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833-1949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增订本,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 [13]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14]史和, 姚福申, 叶翠娣,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15]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833-1949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增订本,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 [16]上海图书馆,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第一, 二, 三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1984.
- [17]政协温州市鹿城区委文史组编, 鹿城文史资料, 第1辑.
- [18]周厚才, 温州港史,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
- [19]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20]上海图书馆编, 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四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1]张宪文编, 孙诒让遗文辑存,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22]孙延钊编,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 第3册, 温州市图书馆藏原稿.

- [23] 戊戌变法，中国史学会编，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2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5] 陈虬《致杨逢春书》手迹，温州市博物馆藏.
- [26]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
- [27] 祝荃梅，我所看到两种最早的中医期刊，中华医史杂志，1953，(3) .
- [28] 赵晓兰，浙江近现代报刊史概述，出版发行研究，2002.
- [29] 龚新琼，论新闻吸引力的两个维度，新闻与传播，2007，4.
- [30] 唐海江，政治心态与清末政论报刊的资本募集，国际新闻界，2006，9.
- [31] 葛兆光，祭罢炎黄祭女娲？，南方周末 2008, 3, 27.
- [32] 刘时觉，陈克正，杨力人等，近代温州医学代表人物和维新思潮，中华医史杂志，2006，4，第 36 卷，第 2 期.
- [33] 胡滨，清末民国时期的浙江中医界，中华医史杂志，1997，10，第 27 卷，第 4 期.
- [34] 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医史杂志，1980，第 10 卷，第 2 期.
- [35] 金日红，利济医学堂始末及教学概况，中华医史杂志，1982，第 12 卷，第 2 期.
- [36] 刘时觉，朱国庆，杨力人等，晚清的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医古文知识，2003，3.
- [37] 廖家兴，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见解，浙江中医杂志，1980，1.
- [38] 姚远，陈懿文，中国科技期刊史研究评述，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7，18 (1) .
- [39] 张惠民，我国早期科技学术期刊的传播学思想研究，编辑学报，2005，4，17 卷，2 期.
- [40] Wenner, L, The Nature of News Gratification. , In K. E. Rosengren, 1985, p173.

致谢

在结束此文时，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春泉教授，感谢他七年来对我知识上的浇灌和引导，感谢他在论文写作中对我的宽容与帮助，感谢他人格上对我的指引，感谢他一步步带我走向成熟。

我还要感谢姚远老师对我的无私帮助，感谢他真挚的意见、感情和关怀。

感谢的人其实不胜枚举，在我的成长路程中，每小步的前进背后都凝聚着大家对我的关爱：我的父母，我的妹妹，新闻学院的所有老师，小娟、小翠、怡方等等同学……谢谢大家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怀着真诚感恩之心的吴幼叶

附录

本人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科研成果如下：

于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新闻知识》2006年第7期上发表《浅析当代理论新闻学之学科基础》。

于高校综合性学报核心期刊《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37卷第5期上发表《最早的高校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及其中医传播》。

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基于现代报刊视野的描述和分析

作者: [吴幼叶](#)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吴幼叶](#). [王睿](#). [杜月英](#). [郑俊海](#). [姚远](#). [WU You-ye](#). [WANG Rui](#). [DU Yue-ying](#). [ZHENG Jun-hai](#). [YAO Yuan](#) 最早的高校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及其中医传播 -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7(5)

目的 重新认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创刊于温州的《利济学堂报》的历史地位和中医传播实践.方法 原始文献考证与传播学方法.结果 认定与维新变法共命运的《利济学堂报》为中国高校科技学报的萌芽,亦为中国最早的医药学报之一和浙南最早的维新变法报刊,其主办机构利济医学堂为中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结论 陈虬首创的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利济学堂报》、心兰书社构成四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传播组织结构和医疗传播、教育传播、期刊传播和图书馆传播相辅相成的特殊模式,构成了一个极具新闻学与科技传播学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并成为之后高校科技期刊的范本.

2. 期刊论文 [刘时觉](#). [朱国庆](#). [杨力人](#). [陈克正](#). [李珍](#). [瞿汉云](#) 晚清的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 - 医古文知识 2003, 20(3)

通过对温州古籍文献整理,发现1885年陈虬、陈葆善等创办的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是浙南最早的医院,中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1896年陈虬主编出版的《利济学堂报》,是我国中医药学报之始,也是高校学报之始.介绍利济医院、医学堂、学堂报之规划设想、习医章程、教学计划、办刊宗旨、股份分派、人员组成、经济核算、运作过程等.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53884.aspx

授权使用: 温州大学图书馆(wzdxstg), 授权号: f216cad0-c9a7-46ba-8ac7-9d9e01110b2a, 下载时间: 2010年6月23日